



# FOCUS

# 高层动态

2021年6月21日

兰瑞智库  
经济战略研究

**指点江山**

**思入风云**

**菩提明镜**

**大道之行**

主办：兰瑞智库经济战略研究中心

<http://www.runwaysys.com>

全国客服热线：4001182162

E-mail: [runwaysys@163.com](mailto:runwaysys@163.com)

在中国的国情下，中央高层的行为、语言、倾向，会对政策、宏观环境产生重大的影响。

在中国，要做出正确的决策，必须把握政经趋势，而把握政经趋势，最不确定性的因素、最难把握的是中国的国情，而可能破解这一难题的，正是对中央高层动向的动态分析。

哪些问题受到高层关注？哪些人的思想在影响高层的决策？我们处在这样一种环境中，又该如何采取针对性措施？

本报告力图提供一个关键性的分析框架，将中央高层动向及其影响分析与政经趋势分析相结合，从而达到把握最重要的决策要点的效果。

本报告力求提供的参考意见是有价值的，望您善加利用并慎重决策。



## 本期目录

<b>最新动向</b> .....	3
【习近平：铭记奋斗历程担当历史使命 从党的奋斗历史中汲取前进力量】.....	3
【李克强：针对今年以来农资价格较快上涨对农民一次性发放补贴】.....	4
【李克强：培育壮大市场主体 推动东北全面振兴实现新突破】.....	5
【汪洋：提升协商质量 更好彰显我国新型政党制度优势】.....	5
<b>问题探射</b> .....	7
【提升劳动力素质延长人口红利】.....	7
【要素市场化改革并没有完成】.....	10
<b>人物关注</b> .....	12
【楼阳生当选河南省人大常委会主任 王凯当选省长】.....	12
<b>智囊高参</b> .....	13
【陈道富：发展数字经济如何平衡隐私保护与价值挖掘】.....	13
【张其仔：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与新型工业化】.....	17
<b>虎视寰球</b> .....	23
【七国集团峰会何以成为“道义上的失败”】.....	23
【大幅上调通胀预期 美联储放“鹰”了】.....	25
【十年后再回谈判桌 美俄关系却仍难破冰】.....	27
<b>华夏透视</b> .....	29
【关键的改革与质量的提高：中国高校人事制度】.....	29



## 最新动向

为什么要对中央高层的最新动向紧密跟踪？因为他们的行为、语言、倾向，会对政策、宏观环境产生重大的影响。可以这样说，在中国，要做出正确的决策，必须把握政经趋势，而把握政经趋势，最不确定性的因素、最难把握的是中国的国情，而可能破解这一难题的，正是对高层动向的动态分析。对高端决策来说，高层动向的紧密跟踪是研究分析的关键性资源。

### 【习近平：铭记奋斗历程担当历史使命 从党的奋斗历史中汲取前进力量】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 6 月 18 日前往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参观“‘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并带领党员领导同志重温入党誓词。他强调，党的历史是最生动、最有说服力的教科书。我们党的一百年，是矢志践行初心使命的一百年，是筚路蓝缕奠基立业的一百年，是创造辉煌开辟未来的一百年。回望过往的奋斗路，眺望前方的奋进路，必须把党的历史学习好、总结好，把党的宝贵经验传承好、发扬好，铭记奋斗历程，担当历史使命，从党的奋斗历史中汲取前进力量。要教育引导广大党员、干部通过参观学习，更加自觉地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始终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坚定理想信念，学好用好党的创新理论，赓续红色血脉，发扬光荣传统，发挥先锋模范作用，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更好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全面做好改革发展稳定各项工作，汇聚起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磅礴力量。

新近落成的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巍然矗立，气势恢宏。下午 3 时 20 分许，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同志来到这里，步入展厅参观展览。展览以“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为主题，精心设计了“建立中国共产党 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伟大胜利”、“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 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实行改革开放 开创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4 个部分，通过 2600 余幅图片、3500 多件套文物实物，第一次全方位、全过程、全景式、史诗般展现中国共产党波澜壮阔的百年历程，浓墨重彩地反映党的不懈奋斗史、不怕牺牲史、理论探索史、为民造福史、自身建设史，使人们深刻认识到红色政权来之不易、新中国来之不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来之不易，深刻认识到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

气势磅礴的长城主题漆画、马克思《布鲁塞尔笔记》第四笔记本手稿、一大会议复原场景、革命根据地的创建展板、遵义会议复原景观、党的七大投票箱、开国大典影像、抗美援朝战争中使用过的武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讲话提纲、创办经济特区图片、脱贫攻坚数据图表、火神山雷神山医



院模型……珍贵的文物实物、翔实的档案资料、生动的图片视频、逼真的复原景观，吸引了习近平等领导同志的目光。他们不时停下脚步仔细观看，认真听取讲解，详细询问有关情况。参观结束后，习近平等党员领导同志来到党史展览馆红色大厅。面向鲜红的中国共产党党旗，习近平举起右拳，带领领导同志重温入党誓词，铿锵有力的宣誓声响彻大厅。（据新华社）

[Top](#)

### 【李克强：针对今年以来农资价格较快上涨对农民一次性发放补贴】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6月18日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针对今年以来农资价格较快上涨对实际种粮农民一次性发放补贴；决定扩大粮食作物完全成本保险和种植收入保险实施范围，增强农民抵御风险能力；部署进一步推动金融机构减费让利惠企利民；确定加快发展保障性租赁住房的政策，缓解新市民青年人等群体住房困难；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与计划生育法（修正草案）》。

会议指出，农业是稳民心、安天下的产业。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粮食生产和粮食安全。考虑到今年以来受大宗商品价格上涨影响，化肥、柴油等农资价格明显上涨，当前正值夏收夏种关键时期，为保护农民种粮积极性，会议决定，在加强农资市场调节、引导企业增加国内市场供给的同时，立足我国发展中国家实际，根据主要粮食作物农资等价格上涨情况，中央财政安排200亿元左右资金，对实际种粮农民一次性发放补贴，以稳定农民收入。补贴资金要抓紧发放到位，不误农时。为帮助农民抵御灾害等风险、稳定种粮收益，会议决定，今年在全国13个粮食主产省份，对500个产粮大县实施稻谷、小麦种植完全成本保险，覆盖种子、农药、化肥等直接物化成本和土地、人工成本，弥补自然灾害、病虫害等导致的损失；实施玉米种植收入保险，弥补因价格、产量波动导致的损失。两种保险保障水平最高可达相应品种种植收入的80%，保险费率按保本微利原则确定。明年推广至主产省份所有产粮大县。加大保险保费财政补贴，其中省级财政补贴不低于25%，中央财政对中西部及东北地区补贴45%。

会议指出，去年金融机构减费让利有效支持了市场主体纾困发展。今年要继续发挥金融机构作用，采取6方面减费措施，帮助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降低成本，减轻上游大宗商品涨价传导压力。其中包括：鼓励免收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等支付账户提现手续费，将网络支付商户手续费降低10%，降低银行卡刷卡手续费，推动减免小微企业跨行转账汇款手续费，推动降低自动取款机跨行取现手续费等。这些措施预计每年可为企业和群众减负240亿元。

为保障城镇化进程中进城务工人员、新就业大学生等新市民、青年人基本住房需求，会议确定，一是落实城市政府主体责任，鼓励市场力量参与，加强金融支持，增加租金低于市场水平的小户型保障性租赁住房供给。二是人口净流入的大城市等，可利用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企事业单位自有土地建设保障性租赁住房，允许将闲置和低效利用的商业办公用房、厂房等改建为保障性租赁住房。三是从10月1日起，住房租赁企业向个人出租住房适用简易计税方法，按照5%征收率减按1.5%缴纳增值税；对企事业单位等向个人、专业化规模化住房租赁企业出租住房，减按4%税率征收房产税。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与计划生育法（修正草案）》，决定将草案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据新华社）

[Top](#)



### 【李克强：培育壮大市场主体 推动东北全面振兴实现新突破】

6月15日至1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吉林省委书记景俊海、省长韩俊陪同下，在松原、长春考察。他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更大力度推进改革开放，培育壮大更多市场主体，增强经济发展动力。李克强十分关心粮食生产。在松原市，他走进农田察看玉米长势，与农民、农技人员交流。大家告诉总理，今年墒情和气候好，粮食有望丰收，但尿素、柴油等农资价格涨得多，近期玉米价格回落也让心里不踏实。李克强叮嘱随行有关负责同志，当前是粮食生产关键期，要采取有效措施平稳农资价格。他说，中国人口多，粮食足天下安。要保持合理粮价水平，遏制农资价格上涨，保护好种粮农民积极性。他强调，要守护好宝贵的黑土地，培育更多优良品种，让东北这个大粮仓更实更满。

李克强来到查干湖考察生态环境保护。他说，这个大湖对周边生态有重要的调节改善作用。要持续不懈抓水环境保护，以好生态带动渔业等产业发展，把查干湖金字招牌擦得更亮。吉林盼盼食品公司是东部企业投资兴建的。李克强询问企业享受减税降费情况，察看新产品，并与工人们交流。他说，食品业是永远的朝阳产业，市场细分空间很大，希望你们开发更多适应多元消费需求的健康食品。听到企业打算在这里扩大投资，李克强说，东北是兴业发展和生活的好地方，营商环境过了关，就会有更多投资过海关。要着力深化改革，在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培育市场主体上下大功夫，让国内外企业在东北投资更有信心，更好展示东北发展大有盼头、大有希望的前景。

李克强听取了吉林省振兴发展和开放合作情况汇报。他来到中韩长春国际合作示范区考察入驻企业，询问他们对营商环境的感受和建议。他说，我们不仅欢迎大企业来投资兴业，也欢迎中小企业来合作发展。很多中小企业拥有专精特新技术，要提供个性化分类服务，让中小微企业铺天盖地，支撑大企业顶天立地。东北有沿边沿海优势，要着力扩大开放特别是向东北亚开放，抓住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契机加强区域合作，形成共享的产业链，让东北发展的龙头昂起来、活力迸发出来。在民营企业创办的摆渡创新工场，李克强对这里通过孵化和风投相结合促进创新、政府提供现场便利服务予以肯定。他观看创新成果，称赞小产品里有大追求。李克强询问创客们创业经历和需要哪些支持。他说，我们持续推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就是要更大激发社会创造活力。众人划桨行大船，既发挥各自优势，又同舟共济攻克难关，就能把创新的大船驶向一个又一个成功的彼岸。

李克强充分肯定吉林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成绩，希望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开拓创新、扎实苦干，在推动东北全面振兴、高质量发展中作出新贡献。（据新华社）

[Top](#)

### 【汪洋：提升协商质量 更好彰显我国新型政党制度优势】

中共中央统战部6月16日在京组织召开调研协商座谈会，就相关党派团体开展的“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调研成果进行协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汪洋出席会议并讲话。

汪洋指出，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作出的重大部署，也是中共中央审议批准的2021年政党协商的重要议题。在“十四五”



开局之年，各党派团体围绕这一课题开展调查研究，察实情、建真言、谋良策，具有重要意义。希望各党派团体用好调研协商的成果，进一步完善调研报告，促进中共中央科学决策的有效实施。各党派团体要充分发挥人才荟萃、智力密集的优势，积极参与国家重大科技项目实施，持续开展协商议政，广泛凝聚社会共识，为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加快建设科技强国贡献智慧力量。有关方面要深刻认识调研协商是政党协商的重要制度安排，进一步改进和完善调研协商座谈会的程序和方式，提升协商质量，更好彰显我国新型政党制度优势。

民革中央主席万鄂湘、民进中央主席蔡达峰、农工党中央主席陈竺、九三学社中央主席武维华、全国工商联主席高云龙在座谈会上介绍了调研成果。大家高度评价中共十八大以来我国科技创新事业取得的历史性成就，从不同角度指出了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存在的障碍和问题，提出了务实中肯的政策建议。民革中央建议修订科学技术进步法，全面梳理涉及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的法律法规，强化知识产权司法保护，构建引领性科技创新政策体系。民进中央建议强化科研立项统筹和引导，规范科研权益，理顺科研系统企事业单位的隶属关系，落实科研单位自主权。农工党中央建议紧扣国家战略需求优化完善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布局，强化生命健康领域国家重点实验室建设，加快公共卫生体系改革。九三学社中央建议加强对国家科技创新平台顶层设计，推动科研力量优化布局和资源共享，统筹推进区域协同创新，改变各级各类平台抢名头、挂牌子、戴帽子、占位子等现象。全国工商联建议切实发挥企业创新主体作用，推动形成有为政府与有效市场双支撑、大型企业与小微企业双联动、企业家精神与科学家精神双引领的国家战略科技发展格局。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统战部部长尤权主持会议。郑建邦、刘新成、何维、邵鸿参加会议。国家发展改革委、教育部、科技部、司法部、财政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知识产权局负责同志与党外人士进行了互动交流。（据新华社）

[Top](#)



## 问题探射

哪些问题受到高层关注？哪些问题将被高层关注？如何解决这些问题？问题的发展和解决方式将怎样影响相关问题和同类问题？这些问题又如何影响我们的宏观环境？我们处在这样一种环境中，又该如何采取针对性措施？本栏目通过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方法，使得我们对于高层动向的追踪变得具有很强的实践性和功能性，其方法对我们的决策分析具有启迪意义，也将极大提升我们的决策分析的利用价值。

### 【提升劳动力素质延长人口红利】

1980~2010年，中国的劳动年龄人口占比持续快速增长，不断降低的人口抚养比使中国的储蓄率和投资率上升，最终使中国物质资本得到了快速积累；而劳动年龄人口的不断增加又为劳动力市场提供了大量劳动力供给。与此同时，随着总和生育率的不断降低，父母能够为“有限”的子女提供更多的教育投入，从而带动了人力资本的快速上升。可以说，上述供给侧生产要素的变化是由人口转变带来的一系列内生结果。

这一时期的人口转变带来了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的快速积累，并使劳动力供给得到快速增长，最终打开了中国潜在的人口红利机会窗口——中国具有了高速增长潜力。同时，在出口导向型经济打开国际市场的同时，外需增加也使得经济增长潜力得到充分释放，最终获得了高速的实际经济增长。我们将这一时期人口转变带来的高速增长现象称为“人口红利”。根据笔者测算，这一时期人口红利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达到了25%。从潜在增长率视角出发，1980~2010年物质资本存量、劳动力供给、人力资本和全要素生产率对潜在增长率的贡献分别为46.7%、10.2%、5.5%和37.6%。这一时期的人口红利主要由劳动力数量增长所带动。

然而，人口结构变化是动态的。从2011年开始，中国的人口结构发生了根本的转变，劳动年龄人口占比从之前的持续增长转变为持续降低，有利于经济增长的人口结构发生了改变。根据测算，从“十三五”开始，中国的人口红利就已经开始减弱。实际上，人口红利包括三个方面：第一，劳动年龄人口快速增长带来的劳动力供给潜力增加；第二，人口抚养比降低带来的物质资本快速增长；第三，生育率降低带来的教育投入增加和教育年限延长，从而使得人力资本得到快速增长。中国劳动年龄人口占比开始不断降低，老龄化程度不断加剧，导致形成人口红利的第一个因素——劳动力供给开始减少，同时，抚养比上升将使储蓄率和投资率下降，物质资本积累速度放缓。从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来看，15~59岁劳动年龄人口占比63.35%，比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时下降了6.79个百分点。人口的快速转变导致人口红利不断减弱，然而人们往往忽视了人口红利的第三个要素，即教育投入增加和经济发展带来的人力资本快速增长。笔者认为，要想延



长中国的“人口红利”，必须从依赖劳动力数量转向提高劳动力质量。

中国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15 岁以上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达到 9.91 年，比 2010 年第六普次人口普查时增加了 0.83 年。虽然中国的人力资本得到了快速积累，但是相比于发达国家我们仍有很大的差距。为了便于国际比较，我们采用巴罗和李（Barro & Lee, 2013）提供的 2010 年国际可比平均受教育年限数据（见表 1）。与日本和美国的人力资本水平相比，2010 年中国 15 岁以上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为 8.11 年，比日本少 3.5 年，比美国则少了近五年。值得关注的是，中国“中等教育”（包括初中和高中）平均受教育年限仅有 2.86 年，日本为 4.51 年，美国为 5.58 年。说明我国初中毕业后没有进一步读高中或高职的人口比重相对较高。因为九年义务教育涵盖了小学和初中教育，一些偏远地区的学生在完成了初中教育后就进入了劳动力市场。从宏观层面看，虽然增加了短期的劳动力供给，但是影响了长期的人力资本水平。随着科技进步和产业升级，劳动力市场越来越需要高技能的工人，延长义务教育年限，使义务教育能够涵盖高中和高职，至少能够使中国的“中等教育”平均受教育年限得到提升，进而“高等教育”的平均受教育年限也会有所上升。

表 1 15 岁以上人口的总体和分类平均受教育年限

（单位：年）

平均受教育年限	总体	初等教育	中等教育	高等教育
日本 (2010)	11.59	5.87	4.51	1.21
美国 (2010)	13.09	5.96	5.58	1.56
中国 (2010)	8.11	4.99	2.86	0.25
中国 (2010)	9.08	—	—	—
中国 (2020)	9.91	—	—	—

注：前三行数据来自 Barro 和 Lee 的统计结果，第四和第五行分别来自“六普”和“七普”数据。

从国际经验来看，在 1950 年日本分年龄组的平均受教育年限均明显低于美国。然而，到 2010 年，除了 15~19 岁的平均受教育年限略低于美国，其他年龄组的平均受教育程度反而都略高于美国。这与日本战后大力发展教育，重视“中等教育”密不可分。特别是，20 世纪 50 年代中后期，由于日本开始技术革新，对劳动力质量的要求也越来越高。因此，对技术和熟练工人的需求，迫使日本对高中阶段的职业技术教育进行改革。首先，在中等教育中扩大职业技术教育；其次，通过开设不同学科，增加职业教育的多样化。这项改革最终为日本经济的高速增长作出了贡献。

从可比的巴罗和李的研究数据中发现，2010 年中国 15 岁以上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远低于日本和美国。如果对比中国和日本的人力资本变化趋势可以发现，日本在 1970 年的平均受教育年限和分年龄受教育年限与中国 2010 年非常接近。因此，我们将 1970 年的日本作为基准，假设中国未来人力资本变化与日本相似，并推算中国到 2050 年的平均受教育年限（见表 2）。按照这一推算，我们可以得到中国在基准情形下的人力资本变化趋势。可以看出，到 2050 年中国 15 岁以上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能够达到 11 年。鉴于与中国普查数据相比，巴罗和李的平均受教育年限有所低估，我们认为到 2035 年中国的平均受教育年限大概率达到 11 年，与日本 2010 年人力资本水平相当。然而即便如此，我们仍然与美国存在较大差距。因此迫切需要通过改革延长年轻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



表 2 中国平均受教育年限预测

(单位: 年)

年龄(岁) 年份	15+	25+	15~64	25~64
2020	8.904	7.441	9.488	7.767
2025	9.168	7.718	9.816	8.057
2030	9.483	7.967	10.228	8.310
2035	9.879	8.225	10.722	8.513
2040	10.328	8.755	11.230	9.020
2045	10.728	9.466	11.652	9.833
2050	11.084	9.876	12.081	10.293

数据来源: 笔者计算得出。

第一, 潜在增长率不断放缓的趋势与中国目前的人口结构变化有关——2010年之后中国劳动年龄人口开始减少, 使得潜在的劳动力供给下降, 人口抚养比上升导致消费增加、储蓄减少, 进而资本存量增速放缓。即使我们乐观地认为未来的全要素生产率水平保持不变, 但是人口老龄化对潜在增长率将产生不利的影响。实际上, 提高劳动力素质可以延缓劳动年龄人口数量减少对经济增长带来的不利影响。

第二, 我们必须认识到, 投资是一个国家长期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来源。投资的形式无非两种: 一种是投资于“物”, 即我们常说的通过资本投入增加资本存量; 另一种是投资于“人”, 即通过教育和培训等增加人力资本。无论是物质资本存量还是人力资本存量都是推动长期潜在增长率的主要动力。然而, 2010年以来, 中国资本回报率快速下降, 物质资本投入的边际报酬递减; 相反, 虽然中国的人力资本得到了快速积累, 但是相比于发达国家我们还有很大的差距。与其说继续投资于近乎饱和的物质资本, 不如进一步加大对中国人力资本的投入力度。

第三, 从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来看, 中国15岁以上人口的平均教育年限已经达到9.91年, 虽然仍低于巴罗和李给出的2010年日本和美国的平均受教育年限, 然而这一增加幅度超出了我们之前的测算结果, 按照测算, 中国需要到2035年才能使平均受教育年限接近这一水平。笔者测算, 如果2050年中国年轻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能够延长3年, 则与基准情形相比, 中国的潜在增长率将平均增加0.2个百分点。随着中国经济不断放缓, 教育对增长的贡献将越来越明显。延长平均受教育年限、提高中国整体的人力资本水平, 将有助于减缓潜在增长率的放缓趋势。

实际上, 从发达国家的经验来看, 人力资本的积累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是多方面的。首先, 人力资本可以理解为简单劳动力的倍乘, 当劳动年龄人口减少时, 如果人力资本水平提高, 也可以弥补劳动力减少带来的负向影响。其次, 人力资本水平也决定了一个国家的科技进步, 两者之间是正相关关系。从某种程度上来看, 人力资本水平提高, 也将间接影响技术进步率, 从而促进了全要素生产率和潜在增长率。由于中国潜在增长率的放缓, 增加教育投入, 适当延长教育年限, 将是改善中国长期潜在增长率的重要途径之一。

中国人口结构进入老龄化阶段将影响供给侧要素中的劳动力供给潜力和资本供给潜力, 从而影响中国的潜在增长率。如果我们能够增加教育投入, 提高中国平均受教育年限并增加人力资本水平, 将使潜在增长率得到提升。笔者认为, 增加人力资本的主要途径有以下两点。

第一, 普及高中教育, 延长年轻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中国很多偏远地区



仍然存在教育不足的问题，初中毕业就不再继续上学。显然，随着今后工业的发展和科技的进步，初中所学的知识已经不能满足现代工业对劳动力的需求。如果普及高中和高职的教育，让那些潜在的“初中毕业后就参加工作的年轻人”能够延长三年的学习时间，不仅能够增加技能工人的供给，也能提高未来中国人力资本水平。

第二，改革职业高中教育，多样化发展职业教育。根据市场需求，调整专业科目，增加劳动力供给与实际需求的匹配度。在职业教育改革上，首先，在中等教育中扩大职业技术教育。其次，通过开设不同学科，增加职业教育的多样化。职业教育改革最终为日本经济之后的高速增长提供了保障。中国过去 30 多年的投资更多偏向了基础设施，物质资本确实对中国过去 30 年的经济增长作出了极大的贡献。未来，如果我们转变思维，加大对人力资本的投入力度，普及高中教育、改革职业教育，同时提高教育质量，那么人力资本在未来经济增长中将发挥重要作用。

（来源：《中国金融》2021 年第 11 期，作者：陆旸，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研究员）

[Top](#)

### 【要素市场化改革并没有完成】

国内外有的人士似乎潜意识地认为，只要消费品和生产资料的价格确定和供需平衡 99% 以上由市场决定，中国市场化改革就基本完成了。这是表面的感觉。实际上，市场经济最为基础的是，由市场价格和供求信号来配置资源——生产要素。一种要素，一部分，甚至一小部分由扭曲的市场配置；另一部分，甚至是大部分由计划和行政方式配置。这种配置格局，肯定不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而且会形成二元体制扭曲，导致要素闲置和低效率，造成生产的巨大损失。从这个视角看，中国市场取向的改革结束了吗？回答非常清楚：没有结束。自 1978 年以来，从各基本生产要素配置市场化改革的启动先后、规模演变、体系进化等逻辑看，先是进行了资金有偿使用的市场化改革，再是推进了劳动力要素的市场化配置转变，最后才触及到土地要素的市场化改革攻坚，至今才刚刚开始。

#### ■最早开始的是资本要素的市场化改革

1979 年以前，国有企业流动资金和固定资产的来源是财政无偿拨款；从 1980 年起，先在实行利润留成制度的部分国有企业进行征收固定资产占用费的试点；从 1985 年起，国有企业固定资产投资从财政拨款全面改为贷款，并且包括个体、私营和外资等企业的长短期资金在内，大多由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贷款配置。后来形成企业流动资金和固定资产长期投资，由银行贷款供给；1990 年建立上海和深圳交易所，形成企业上市融资、发行债券和证券买卖等资本市场。虽然资本要素市场还存在垄断和歧视现象，但还是基本形成了资本由供求和利息调节配置的市场体系。然而，信贷、债券、股权、股票等等资本市场化配置方面，也还是存在着对民营经济、技术创业、中小微企业、农村农民的审核、配额和费率的二元歧视。资本配置市场化改革，仍需要进一步深化。

#### ■再是推进了劳动力市场化改革

劳动力的市场化配置，发端于 20 世纪 80 年代后期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大规模外出，并且到 21 世纪初已经初步形成了劳动力要素配置的市场体系。整个 80 年代，城镇职工就业仍然以计划招工制招进，但企业并没有建立使劳动力退出的



机制。用工单位与劳动者之间没有用工与劳动之间的市场化契约。80年代后期，中国出现了大规模的外出民工潮，用工方主要为个体、私营、外资和有限责任公司等企业，国有企业的编外工人，建设项目工地用工，家庭用的保姆。工资随行就市，或者简单劳动合同或者口头契约。初步形成了不规范的劳务市场。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家进行了一系列改革来推进劳动力的市场化配置。对农民工外出的务工证和各种行政收费进行了清理；起草和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进行了下岗、分流和再就业的改革；国有企业、集体企业和事业单位员工的招收，先是从学校的分配制和用人单位的计划制，改革为双向选择，最后改革为毕业生不计划分配而自己寻找工作；对流动人口先是发放暂住证，2015年改革为居住证。进入21世纪后，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各地相继设立了最低工资线，允许注册劳务派遣公司开展经营活动，工资由用人单位和劳动者双方谈判确定，形成诸多的劳务和人才网，允许猎头公司进行高端管理和技术人才的寻找、介绍和入职等经营服务。

然而，迄今为止，在人口市民化和劳动力流动方面，户籍放开并没有彻底得到落实，对务工人员子女教育公共服务并没有均等化提供，进入城市务工人口的居住成本门槛太高，城乡统一的基本社会保障体系也没有形成，分配于他们的土地房屋却不能通过市场机制而有偿退出造成人口流动的土地粘性。因此，劳动力要素流动的市场化配置，需要协同推进、综合改革。

### ■真正的土地要素市场化改革才刚刚启动

土地市场化改革虽然开始于20世纪90年代，但由于改革目标不明确、体制被扭曲和步伐很缓慢等原因，土地要素配置领域目前是计划调节和行政管制力度最大的部位。2020年4月，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出台了深化和推进要素市场化改革的意见，土地要素配置的市场化改革放在首位。其才刚刚启动，城乡统一土地市场的建设可能要贯穿于未来5-8年之中。因此，经济体制中最大的扭曲是土地要素配置体制的扭曲，最大规模的闲置和低利用要素是城乡体制性剩余土地。未来最需要的是对土地要素配置进行市场化改革，而最大的增长潜能来自于城乡土地要素市场化改革后配置的改善。

*（来源：新浪意见领袖，作者：周天勇，东北财经大学国民经济工程实验室主任）*

[Top](#)



## 人物关注

毫无疑问，人是社会和经济环境中最活跃的因素。那么，哪些人的思想在影响中央高层的决策？哪些人会特别受到中央高层的关注？这些人的性格特征、思维方式、行为方式和思想倾向是什么？这些特征如何影响事态发展？他们怎样影响中央高层、怎样影响周边环境？“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在巨大的不确定性条件下，人物分析将有助于揭开复杂事物的真相，从而帮助我们做出正确的选择。

### 【楼阳生当选河南省人大常委会主任 王凯当选省长】

#### 楼阳生当选河南省人大常委会主任 王凯当选省长

据《河南日报》消息，6月16日下午，河南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选举楼阳生为河南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主任。会议选举王凯为河南省人民政府省长。楼阳生，男，汉族，1959年10月生，浙江浦江人，1976年8月参加工作，1981年1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在职研究生学历，工商管理硕士学位。王凯，男，汉族，1962年7月生，河南洛阳人，1983年10月参加工作，1984年1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经济思想史专业毕业，在职研究生学历，经济学博士学位。（据《河南日报》）

#### 段文龙当选河南省人民检察院检察长

据《河南日报》消息，6月16日下午，河南省十三届人大五次会议举行第二次全体会议，段文龙当选为河南省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按照法律规定，选出的河南省人民检察院检察长，须报经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段文龙，男，汉族，1965年7月出生，辽宁凌海人，大学学历，法学硕士学位，1986年7月参加工作，1991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现任河南省人民检察院党组书记、检察长。（据《河南日报》）

#### 陈伟俊任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政府常务副主席

据《新疆日报》消息，6月10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召开深化“放管服”改革、着力培育和激发市场主体活力电视电话会议。自治区省委常委、自治区常务副主席陈伟俊主持会议。据了解，这是陈伟俊首次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政府常务副主席身份公开亮相。据中国经济网地方党政领导人物库资料显示，陈伟俊，1966年6月生，长期在浙江省工作，曾任湖州市委书记，浙江省副省长、温州市委书记等职，2019年任浙江省委常委、温州市委书记，近日任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省委常委、区政府副主席。（据《新疆日报》）

[Top](#)



## 智囊高参

百战百胜，非善之善也；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故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

在中南海内外，活跃着一个特殊的幕僚群体，他们为中央高层出谋划策，并有意无意地向外界释放思想、建议、政策措施等相关信息。关注他们的观点、建议和动向，就好像“更上一层楼”，可“穷千里目”。

### 【陈道富：发展数字经济如何平衡隐私保护与价值挖掘】

数字经济时代下，合理保护用户隐私，发展数据产业链，共享并充分挖掘数据价值，是国家的核心竞争力。隐私保护的法律规定是影响数字经济发展的关键。当前中国正加快推进个人隐私保护基础性立法，需充分考虑中国的基本国情和社会习惯，着眼国际数字产业竞争格局，统筹考虑中国数字产业的未来发展，通过合理设计法律和政策尺度，平衡好隐私保护与数据共享。

#### 一、数据共享是数字时代国家的核心竞争力

数据是数字时代的核心生产要素，但只有经过充分挖掘并使用才能实现价值。在大数据时代，单个数据几乎没有使用价值，只有相互关联的大量单体数据，经过合理加工后才拥有价值。数据价值挖掘和价值实现是需要高投入的创造性劳动，是数字产业发展的关键环节。因此，数字经济时代国家层面的竞争，就是建立一套更合理有效的激励约束机制和基础设施，降低成本和激励相容地实现数据收集、加工处理、共享使用的数据产业链社会化分工合作。数据产业发展，既要防止信息的不当使用可能危害消费者和社会利益，也要充分调动数据收集、加工和使用者的积极性，“看见”、“挖掘”并“实现”价值。

从国家资源组织的角度，凝聚信任从而实现数据共享是提升数字经济时代国家竞争力的关键。有效的数据共享，要实现数据主体、数据控制者（大部分也是数据采集者）和数据使用者三者间的利益平衡，处理好隐私保护、数据安全和数据价值挖掘、实现的关系。

当前数据市场出现的大数据杀熟、暴力催收等种种乱象，与中国尚未建立合理有效的数据共享机制有关。数据控制者因担心数据泄漏无法获得变现环节的合理回报，将数据加工处理环节内部化，导致数据孤岛现象，表现为过度采集消费者数据，泄漏个人隐私，滥用数据侵害消费者权益等。

#### 二、隐私计算可在合理有效保护个人隐私基础上实现数据共享

保护个人隐私是数据利用的前提和基础。个人隐私保护可从三个方面的组合实现。一是法律保障。通过界定个人信息主体的权属和相关人员的行为空间来保



护个人隐私。二是技术实现。通过数据处理、计算方法和管理技术等确保个人隐私。三是利益平衡。通过市场交易，以自愿承担一定隐私泄漏风险为对价获得更好服务或收益。

隐私计算是隐私保护前提下数据共享的技术实现路径。为解决互不信任的多个机构间数据共享和数据价值挖掘问题，国际上开发出了在不共享原始数据前提下实现数据价值挖掘和流转的技术手段，即隐私计算。隐私计算一般通过三个环节保证数据和模型隐私，实现数据“可用不可见”、“可算不可识”和“可用不可拥”。

一是原始数据的“去标识化”。确保合作第三方不能通过数据反向逆推出数据主体，即不能识别出消费者的“自然人”身份，但又尽可能保留数据中的“信息”价值，做到共享信息的“可算不可识”。

二是可信的执行环境。通过硬件化、安全沙箱、访问控制、数据脱敏、流转管控、实时风控和行为审计等技术手段，提升数据和模型计算环境的安全性，确保全程安全可控。

三是能够保护数据和模型隐私的智能计算技术，如多方安全计算、差分隐私、联邦学习等。用户的原始数据可以在不出域、不泄漏的前提下共享并提取数据价值，实现信息的“可用不可见”。

国内外利用隐私计算平衡隐私保护和数据价值流转已经取得了积极成效。运用隐私计算技术，“去标识化”后的数据可以实现绝大部分个人隐私保护要求。隐私计算过程中，在经过去标识化和多方安全计算分片处理后，第三方已无法通过共享的数据来反向逆推出数据主体的个人身份，不会泄露个人隐私。因而不需要在“去标识化”数据加工处理过程中再获得信息主体的确认“授权”。

### 三、合理保护个人隐私推动数据产业发展是国际趋势

美国隐私保护标准相对宽松，数字经济也较发达。美国无论现行的隐私法案 CCPA 还是计划实施的 CPRA（注：加州消费者隐私法，预计 2023 年 1 月 1 日生效。），对个人数据利用都更为开放，更强调市场自我调节，意在保持互联网第一大国的全球竞争力。如 CCPA（注：加利福尼亚消费者隐私保护法，已于 2020 年 1 月 1 日起生效）允许企业通过提供经济激励获得消费者对收集个人信息的许可，允许依据个人信息价值实施差别待遇，明确企业豁免情形等。

欧盟开始反思个人信息利用限制过严的弊端，致力于建立欧洲单一数据市场。2020 年 2 月欧盟发布《欧洲数据战略》，指出过于严苛而繁琐的个人信息收集约束，可能会导致产业或公共数据供给不足，不利于建设欧盟统一数字市场。2020 年底欧盟《数据治理法》（草案）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既往对数据利用的严苛态度，允许个人数据在“利他主义”或中介机构帮助下使用，允许公共部门数据在受他人权利约束下重复使用。2020 年初发布《欧洲数据战略》，通过加强数据共享建立欧洲单一数据市场。如公共数据的开放共享，包括以符合 GDPR 方式保证数据在技术层面具有可用性，便利以公共利益为目的的个人数据使用和实现更多高质量公共数据的再利用，又如通过开放银行推动金融领域数据开放。

新加坡重新调整了个人同意和企业责任之间的平衡。新加坡认真反思了个人信息保护中的“基于同意”方法的有效性。新加坡政府意识到政府和企业越来越不可能在“授权同意”时就预测到收集、使用或披露个人数据的目的，且在每一次数据收集中都要求个人明确同意并不总是切实可行，导致了大量冗长或措辞宽



泛的通知。最重要的是，个人的同意决定并不一定考虑到对公众更广泛、系统的利益，也不一定会产生社会最理想的集体效果。最终 2020 年 5 月新加坡修订《个人数据保护法》，对“知情同意”的基础性规则引入“合法利益”和“业务改进”两个新的除外规定，在符合个人利益、强化数据保护问责机制和执法有效性的前提下，赋予企业在未经同意的情况，将个人数据用于特定的业务改进，实现合法利益。

#### 四、中国平衡隐私保护和数据共享的政策建议

在当前全球数字产业竞争日益加剧的背景下，中国数据治理规则设定宜着眼国际竞争，通过合理设定政策尺度，完善技术手段，切实平衡好隐私保护和数据共享。

##### （一）动态、适度保护个人信息

个人信息保护是数据治理的关键之一，也是平衡行业发展和消费者保护的重点。个人信息保护并不是越严格越好，并且个人信息保护的程度和内容，应随数据市场发展而不断调整。目前国际上通常通过对信息收集、使用的“知情同意”方式保护。实践证明，设置过多的事前同意环节并不能真正达到保护个人信息的目的，重点应放在事中的风险管理和事后的权利救济上。真正实现个人隐私保护，除了需明确个人数据的人格权利和财产权利外，还需要适应技术发展趋势的科学制度设计保障，特别是需重点关注个人能真正行使权利，以及在权力受到损害后可得到及时救济。个人对信息安全、不同使用目的和方式的认知与市场的探索是相互迭代推进的，因而不宜一步到位，既看不清，也可能制约行业发展，需逐步探索，仅对共识和必要部分规范，分歧和看不太清楚的可暂不规范。

2020 年 10 月，《个人信息保护法》（草案）（以下简称《草案》）首次提交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并已列入 2021 年审议重点。这是个人信息保护的重要上层法律建构，宜在法律设计中平衡各方权利义务，考虑中国国情和经济发展阶段，顺应甚至引领未来数字经济发展趋势。

##### 1、适当“窄化”个人信息定义

“个人信息”的定义是《个人信息保护法》的起点和最核心概念。个人信息包括基本个人信息（姓名、性别、联系方式等）、伴生个人信息（财产信息、账户信息、信用信息等）和预测个人信息（大数据画像）三类，后两类又称为衍生信息。在保护个人隐私前提下使衍生个人信息有序流动和利用是激活数据要素潜能、推动数字产业发展的关键。《草案》第四条将其定义为“以电子或其他方式记录的与已识别或可识别的自然人有关的各种信息，不包括匿名化处理后的信息”，在“识别说”基础上增加了关联性考虑，涵盖“与已识别或者可识别的自然人有关的各种信息”，极大扩展了个人信息范围，且与民法典及《网络安全法》等现行立法对个人信息的定义不一致，将显著增加企业使用数据的限制与合规压力。且“可识别”与“匿名化”相结合，随着技术的不断发展，实际上很难实现对“匿名化”信息的真正排除。建议与民法典保持一致，将“个人信息”修改为“以电子或其它方式记录的能够单独或者与其他信息结合识别特定自然人的各种信息，不包括匿名化处理后的信息”。

##### 2、明确界定“去标识化”信息

与“匿名化”相比，“去标识化”更可能实现隐私保护与数据利用的平衡。匿名化处理后的数据，虽然无法将同一个人不同时间、不同空间产生的数据关



联起来，但数据间关联性已被不可逆地破坏，散乱为数据碎片，将丧失绝大部分信息价值。而“去标识化”数据在加工处理过程中，既能实现“可算不可识”，又能保留数据间除个人信息以外的关联关系，可挖掘的信息价值较大，且仅在用户“授权”的情况下可重新识别使用。

建议在草案中增加“去标识化”制度的规定。鉴于个人信息具有相对性，经“去标识化”处理且第三方不具有识别能力的信息，对于第三方而言不属于个人信息。提供此类信息应明确作为个人信息处理者向个人告知的例外。

### 3、民事责任设定规则可体现对合规的正向激励

《草案》第65条规定因个人信息处理活动侵害个人信息权益的，如果“个人信息处理者能够证明自己没有过错的，可以减轻或者免除责任”。分析前述规定的文义，个人信息侵权责任的归责原则倾向于无过错责任，即无论个人信息处理者是否有过错，都应当承担责任。个人信息处理者没有过错的，不必然减轻或免除其责任。上述规定体现了对被侵权人的倾斜保护，但过度保护可能带来职业维权、滥诉等新问题。同时，上述规定与民法典确定的责任体系存在矛盾。民法典对无过错责任的表述为“行为人造成他人民事权益损害，不论行为人有无过错，法律规定应当承担侵权责任的，依照其规定”。目前《民法典》实际规定的无过错责任仅包括8种情形。个人信息侵权作为数字经济时代新兴的侵权责任类型，是否达到无过错责任的程度法理上仍存争议。

建议草案从正向激励个人信息处理者主动提高合规程度的考量出发，遵循《民法典》人格权编和侵权责任法的基本规则，以过错责任为归责原则，或明确个人信息处理者的合规免责事由。如此既可协调各数据主体间的利益，促进数字经济有序发展，也能避免可能的职业维权等权利滥用。

#### （二）推动构建政府引导、市场主导为主的多种个人数据共享模式

数字时代，个人信息同时具有个人、行业和公共属性。数据来源于个人行为，由企业或者政府收集加工，并通过特定场景应用实现价值，对社会伦理、生态及其他人有一定影响，拥有一定的公共特征。因而，个人数据应由个人和企业共同所有，由个人、企业和社会（国家）共同参与使用和管理。

数据共享并不是数据的集中，而是数据价值的深层次挖掘和实现。因而数据共享，除了推动数据集中和分级开放外、还需要增强传统数据优势单位的数据挖掘和价值开发能力，提高企业数字化转型的积极性，鼓励市场化的分布式个人行为数据基于隐私计算的数据共享。

1、不同数据类型和应用场景，适用不同的数据共享模式。数据是现实世界的映射。数据种类和收集方式不同，决定了数据内在价值的挖掘和实现方式不同，因而也宜采取不同的数据共享方式。数据共享有三种通行模式。一是政府主导下的数据集中分级使用。二是俱乐部式的数据共享使用，通常由协会或特定机构组织，会员既是信息的贡献者，又是信息的使用者。三是分布式数据共享合作，具有数据收集优势的不同企业、平台之间，通过安全技术实现隐私保护和数据安全基础上的数据共享和价值挖掘。

2、提高政府和传统金融机构的数据价值挖掘能力。传统金融机构和政府拥有大量具有高度价值的结构化数据，但其内在价值并没有被充分挖掘，成为“死”数据。为此，关键是要将“死”数据“盘活”。这需要政府和传统金融机构自身具有数据价值挖掘能力，并借此改变数据收集、存储和管理方式。有财力的政府部门和传统金融机构可组建科技公司或科技团队自我开发。资金或能力不足的机构，宜推动市场合作，通过平台公司和科技公司赋能，实现现有数据价值的再开



发。

3、创造条件推动企业财务、供销和管理的数字化。数字化管理要求企业内部行为较为规范，可主要通过非人格化的算法自动完成。基于税收、内部管理等方面的考虑，中国企业的数字化水平较低，特别是在财务、供应链和销售渠道管理等方面，真正的数字化水平仍较低。中国宜在“减税降费”、“放管服”的大环境下，引导企业将主要精力转向经营和内部管理规范化，推动企业数字化转型。

4、在个人行为数据方面推广基于隐私计算的分布式数据共享。为此，在政策和法律法规制定中为通过技术创新解决数据共享和隐私保护问题预留空间，同时鼓励以多方安全计算、同泰加密、可信执行环境、隐私保护机器学习、差分隐私等关键技术的研发，鼓励算法和可信硬件的国产化，形成自主可控的技术体系。加快隐私计算相关国内标准制定，并积极参与国际标准制定。

(来源:澎湃新闻网, 作者: 陈道富,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 王刚,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所研究员)

[Top](#)

## 【张其仔：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与新型工业化】

### 一、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对工业化提出的新要求

在一般的意义上，广义的工业化就是指现代化，既包括工业在 GDP 中所占比重的提升，工业部门就业比重的提升，也包括人均 GDP、城市化水平的提升，以及技术进步。狭义的工业化则仅指工业产值和就业比重的增加。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中的工业化，有其独特的内容，既非一般意义上的狭义的工业化，也非一般意义上的广义的工业化，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对工业化提出了新的要求。

邓小平同志在提出小康目标时，指的就是人均收入水平。1991 年国家统计局会同计划、财政等 12 个部门的研究人员组成课题组，提出了反映小康社会内涵的 16 个基本指标，这些指标中并没有工业化的指标。党的十六大报告提出的人民生活总体上达到小康水平时，包括城乡居民收入稳步增长；城乡市场繁荣，商品供应充裕，居民生活质量提高，衣食住行都有较大改善；社会保障体系建设成效显著；“八七”扶贫攻坚计划基本完成四大内容。虽然这些内容没有直接包括工业化、城市化的内容，但很显然，没有工业化、城市化作为依托，这些目标都是不可能实现的。

党的十六大报告在宣布人民生活水平总体上达到小康的同时还指出，“现在达到的小康还是低水平的、不全面的、发展很不平衡的小康”。为此，党的十六大报告提出要建设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并把实现人均 GDP 提高与工业化、城市化等挂起钩来。报告明确指出，到 2020 年国内生产总值比 2000 年翻两番目标的实现必须建立在优化结构和提高效益的基础上，强调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必须走“新型工业化道路”。何为“新型工业化道路”？党的十六大报告对此也进行了明确阐述。按党的十六大报告的定义，新型工业化就是指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以工业化促进信息化，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人力资源优势得到充分发挥的工业化。这里提到的人力资源优势得到充分发挥，应包括了两个方面的含义，一是中国的劳动人口规模巨大，二是中国劳动力的素质不断提高。这两个方面的含义表明，新型工业化不是一条完全扔掉传统产业的工业化。巨大的劳动人口规模和不断提高的劳动素质，对中国传统产业发展及改造



升级提出了要求，也是支撑中国传统产业发展及改造的重要基础。

党的十七大报告对党的十六大以来我国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上取得的成就进行了总结，再次提出，要在优化结构、提高效益、降低消耗、保护环境的基础上，实现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到2020年比2000年翻两番。报告同时强调，要显著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大力推进信息化与工业化融合，建设现代产业体系，提高高新技术产业发展水平，促进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第二产业带动向依靠第一、第二、第三产业协同带动转变。

党的十八大报告明确提出了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党的十八大报告把创新的作用提高到了一个新高度，明确提出，要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将推进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作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主攻方向，主要内容包  
括：实行更加有利于实体经济发展的政策措施，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先进制造业健康发展，加快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推动服务业特别是现代服务业发展壮大，合理布局建设基础设施和基础产业；发展下一代信息基础设施和现代信息技术产业体系，推进信息技术广泛运用等。

党的十九报告提出，从十九大到2020年这个时期，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期；要按照十六大、十七大、十八大提出的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各项要求，使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得到人民认可、经得起历史检验。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了我国经济发展阶段与基本矛盾已经发生的变化，就是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基本矛盾已转变成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党的十九大报告对经济发展阶段和基本矛盾的阐释，揭示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进程中我国走新型工业化道路的必要性、必然性和紧迫性。报告明确提出要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在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过程中，必须坚持质量第一、效益优先，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推动经济发展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着力加快建设实体经济、科技创新、现代金融、人力资源协同发展的产业体系。全要素生产率首次出现在了党的文件中。综合十六大以来，十七大、十八大和十九大等报告中有关经济发展和工业化的内容可以得出结论，工业化构成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要内容，而且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对工业化提出了新要求，总体要求是要走一条中国特色的新型工业化之路，一条贯彻和落实新发展理念的新型工业化之路，其主要特色和要求体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1)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所要求的工业化是一个结构优化的工业化。结构变化是衡量工业化水平高低的一个重要标准，传统的工业化标准，就是农业比重的下降，第二、第三产业比重的上升。长期以来，我国工业化的推进也比较重视第二、第三产业比重的提升，特别是第二产业比重的提升，在各个产业内部表现为技术含量、知识含量较高的产业比重提升，资源密集、劳动力密集的产业比重下降。这是工业化的一般性要求，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所要求的工业化当然也不能脱离这个一般性要求，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对结构优化的要求，并不仅限于此。除这个要求外，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所要求的结构优化，还包括了第一、第二、第三产业协同发展的要求。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所要求的工业化是必须是第一、第二、第三产业协同推动的工业化，而不能是一条牺牲农业，主要靠工业或主要靠服务业推动的工业化。

(2)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所要求的工业化是一个创新驱动型的工业化。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改革开放后的一段时期，中国的工业化是要素驱动型的，工业增长主要靠资本和劳动以及其他要素的大规模投入拉动，创新虽然起到了一定



作用，但相比于要素投入，其对工业增长的拉动作用较小，全要素生产率总体水平不高。这种现象并非中国所独有，而是发展中国家在追赶发达国家的过程中的一种常见现象。但随着经济发展阶段的演进，经济规模的扩大，要素的成本——特别是劳动力成本、土地成本的不断提高，后发技术优势随着与前沿技术的趋近而缩小，可引进或吸收的外来技术种类趋于减少，以要素大规模投入拉动工业增长的回报趋于下降，此时，要进一步促进经济增长，就需要大力提升社会的创新能力，提升创新，特别是自主创新对经济增长的贡献。

(3)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所要求的工业化是一个新旧经济融合发展的工业化。中国提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时期，正值全球处于新一轮技术和产业革命的时期。从传统意义上而言，中国在提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时期，工业化进程虽然还没有完成，但在新的技术和产业革命的大格局下，中国的工业化不可能不顾新的技术和产业变革要求，仍完全依照发达国家的顺序，按部就班地从第一次工业革命进入到第二次工业革命，从第二次工业革命进入到第三次工业革命，从第三次工业革命再进入到第四次工业革命，等等。如果这样，中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是难以实现的，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这样一个阶段也就不可能起到承上启下的作用。经济发展有其自身的规律，中国的工业化同样也不可能是完全抛弃传统产业，仅依靠新产业来推动的工业化，而是要走一条传统产业改造不断升级、新产业不断扩张，新旧产业不断融合发展的工业化道路。

(4)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所要求的工业化是一个资源环境友好型的工业化。经济学家在研究经济发展与资源环境保护的关系时，曾经提出过库兹涅兹曲线，也就是倒U型曲线，意思是指，在经济发展水平比较低的时候，资源环境状况是比较好的，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升，资源环境状况会恶化，但并不会持续恶化下去，当经济发展到一定水平时，资源环境状况就会逐渐得到改善。遵循这个逻辑，按发达国家所走过的路径估计，我国仍没有越过库兹涅兹曲线的顶部，资源环境状况还只能继续恶化。一段时期以来，我国的工业化确实付出了较大的资源环境代价，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则要求改变这种状况，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工业化必须是体现绿色发展理念，降低资源消耗、保护环境的工业化，这既是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向往的需要，也是保证工业化可持续性的需要。

## 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程中的中国工业化进展

### (一) 产业结构优化

不断优化产业结构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本要求。2002年以来，中国产业结构总体趋势是第一产业的比重呈下降趋势，第二、第三产业加起来占GDP的比重呈不断上升的趋势（见图1）。从产业结构变迁考察的中国经济增长动力也发生了新的变化，中国经济增长较长一段时间内主要靠工业拉动的格局也在发生变化，2002年以来的总体趋势是，三次产业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越来越明显，2011年第三产业就业占总就业的比重以及2012年第三产业的增加值占GDP的比重首次超过第二产业，2012年与2000年相比，第三产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提高了约10个百分点，2018年与2012年相比，第三产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提升更快，提高了14个百分点以上（见图2）。产业结构优化从产业内部而言，会表现为技术含量、知识含量较高的产业比重上升，资源密集、劳动力密集的产业比重下降。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工业经济内部结构不断优化。2018年，高技术制造业、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占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比重分别为13.9%和



32.9%，技术含量、知识含量较高的主要产品发展势头强劲（国家统计局工业司，201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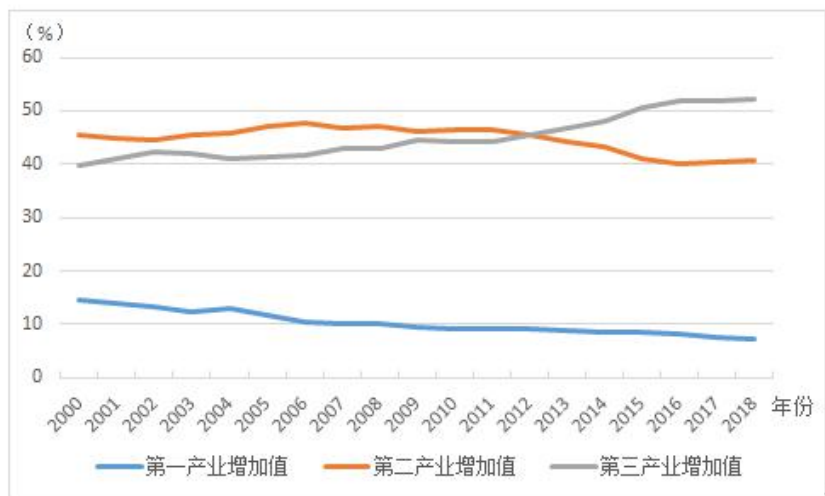


图 1: 三次产业的构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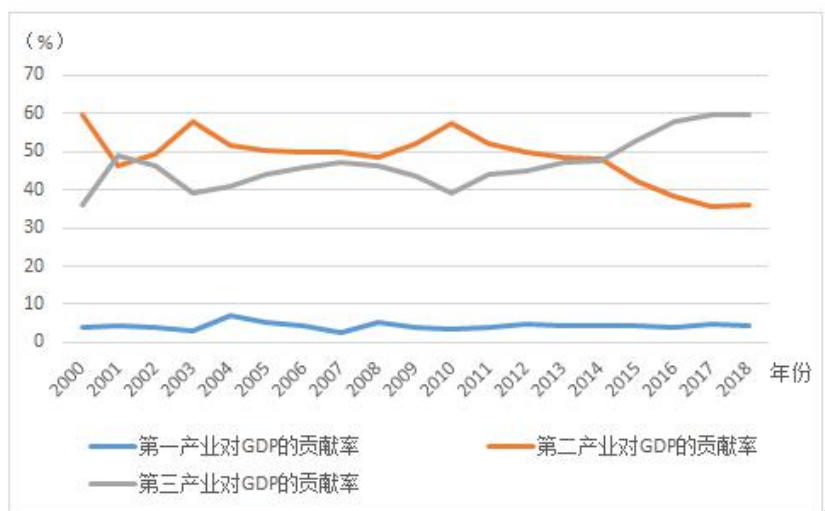


图 2: 三次产业对 GDP 的贡献率

1949 年到改革开放前（1978 年），中国实行的是计划经济体制，学习的是苏联经验，同时也根据自身经验进行了适当的调整：把整个经济部门分为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两大部类，实行的是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方针，到改革开放前，初步建成了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制造业也有所发展，但并没有成为制造业大国。

中国的改革开放解决了向谁学、如何学的问题，确立了实事求是的学习原则，就是我们要学习其他国家的先进经验与技术，但又不能脱离中国的国情和实际。1978 年，《理论动态》发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5 月 11 日《光明日报》以特约评论员的名义在第一版发表此文。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新确立并充分肯定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实事求是路线的确立，为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开辟了道路，也为正确地学习国外先进经验、把国外的经验与中国的实际相结合开辟了道路。当然，中国在改革开放过程中不但确立了实事求是的学习原则，还找到了正确执行这一原则的方



法：对于新事物，先采取试点的办法，通过试点，看是否符合中国的实际，如果试点成功了，符合中国的实际，总结经验、教训，再进行推广。这一做法充分体现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原则，也避免了因完全照抄照搬其他国家经验、照抄照搬本本，而给经济发展造成较大损失的情况的出现。

### （二）尊重大众的首创精神和企业的主体作用

中国的改革开放，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起到了重要作用，而这个制度并不是来自本本、来自西方，而是来自中国农民的伟大创造。也正是这一伟大的创造，启迪和推动了中国的城市的经济体制改革和企业改革。改革开放以前，中国企业的自主权较少、主动性较低，缺乏自主参与国际竞争的能力、参与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体制机制基础。周叔莲、吴敬琏、汪海波在《经济研究》上发文，把企业比作算盘珠，就是企业要靠行政机关从外部推动，推一推，就动一动，不推就不动。改革开放一开始，理论界就对国有企业的性质和地位开展了讨论，在对工业管理体制进行的讨论中，蒋一苇提出了著名的“企业本位论”，指出，过去的经济体制是按“国家本位”建立起来的，把全国当成了一个经济组织，现在要把企业当作一个能动的主体，当作现代经济的基本单位，有独立的经济利益。在新的认识推动下，中国进行了一系列的国有企业改革。初期的国有企业改革，主要是放权让利、探索两权分离，其次是以现代企业制度为方向进行改革，国有企业中开始引入民营资本。政府对国有企业的管理也开始转向管资产。在对国有企业进行改革的同时，中国确立了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的基本方针，个体企业、私有企业、外资企业、中外合资企业等都得到了不断发展。企业参与国际竞争，参与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自主性、能动性不断扩大，创造性不断提高，民营经济和私营企业逐渐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 （三）充分发挥不断扩大对外开放的作用

中国工业不断提高国际竞争力的过程也是不断扩大开放的过程。不断地扩大开放，使中国能利用好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来促进工业的发展，提升中国工业的国际竞争力，锤炼企业的竞争意识和竞争能力。

从全球化的历史看，全球产业分工经历了几个大的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工业和农业等产业的全球化大分工。在这个阶段，发达国家以生产工业品为主，发展中国家以生产初级产品为主，发展中国家主要用初级产品交换发达国家的工业品，在这一阶段中，中国是一个被动的参与者。全球化的第二阶段是部门间分工阶段。在这个阶段，发达国家将一些工业转移到发展中国家，并由这些发展中国家组织生产。在这个阶段，比较先进的工业部门仍保留在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承接的主要是相对成熟和在发达国家组织生产缺乏竞争力的工业部门。在这一阶段，因为西方国家采取封锁政策，中国对全球产业分工的参与十分有限。第三次全球产业分工，表现为产业内分工或者说是产业链分工，就是一个产业被拆分成多个环节，不同的环节被配置到不同的国家进行生产。在这一阶段，发达国家将产业链中缺乏优势、附加价值低的环节转移到发展中国家进行生产。在这一阶段，中国开始成为全球化的主动参与者，通过改革开放，使企业有机会、有积极性和能动性融入到全球产业链中去，使中国的比较优势得以充分发挥，对提升和加快中国的工业化进程起到了十分积极的作用。

坚持扩大对外开放对中国工业化的作用是毋庸置疑的，但对中国在不断扩大开放中提升工业生产能力，西方的学者或政府，特别是美国的一些学者有着错误的认知。美国政府认为，是美国重建了中国，中美之间贸易不平衡问题是因为中国与美国相比，没有实行对等开放，是中国采取了不公平竞争的手段、通过不公



平竞争的方式获得的。这类指责是完全站不住脚的。中国不断扩大开放的过程就是一个不断推动公平竞争的过程，是一个不断扩大开放度的过程，当前中国的经济开放度、竞争公平性，相比以前不仅有着极大的提升，而且有着质的提升，中国工业化的成就完全是伴随着不断扩大开放的过程而取得的。

当然，不断扩大开放并不必然带来工业的高速发展。中国的扩大开放之所以成功，其原因在于中国并非盲目发挥扩大开放的作用，中国扩大开放有其自身的特点：一是中国的扩大开放是一种自主的开放，就是把扩大开放与中国发展阶段和改革的进程相匹配，是主动型的扩大开放，而不是被动型的；二是中国的扩大开放不是谋求单赢，而是追求共赢，中国扩大开放的目标不单是促进中国的经济发展，还要通过扩大开放让世界其他国家分享中国经济发展的红利。三是中国的扩大开放是全面的，不仅是面向发达国家，同时也面向发展中国家。这些特点充分反映出，中国的开放具有包容性，是一种包容性的开放，而非掠夺性的开放。

### （四）充分发挥各地的比较优势

中国与很多发展中国家的一个很大不同，就是中国是一个大国。张培刚教授在谈到建立新型发展经济学时就提出，中国是一个大国，大国经济发展有着不同于小国经济发展的特色，最主要的特色是区域之间差异很大。区域之间差异大，就会产生多样性的优势，政府在推动工业化的进程中，如果考虑了这个特点，就能把这个优势发挥好。林重庚教授在《亲历中国经济思想的对外开放》中就提到，改革开放之初，中国的学者就认识到，中国不可能完全照搬东欧的改革模式。他提到，参加莫干山会议的东欧学者在会后对中国几个城市进行了考察，考察途中改变了想法，中国各地情况差别很大，综合改革所需的人才、物资匮乏，进行一揽子改革的条件不足。中国也正是基于这样的现实条件，逐步推进对外开放，从沿海、沿边到实行全面开放，走了一条让部分地区先富起来，先富地区带动后富地区，从而实现共同富裕的发展道路。

因为地区与地区之间有差异，其人力资源、自然资源和发展阶段都有所不同，这极大地增强了中国经济发展的韧性，增加了回旋余地：一是国内产业体系可更加多样化。地区间存在各类差异，虽然这并不意味着中国应走一条建立一个完全封闭的产业体系之路，但客观上有利于建立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二是地区间发展阶段的差异使得中国可以在内部实现产业的梯度化转移和承接。发达地区在经济发展到一定水平后，可将其不具优势的产业转移到相对落后地区，在国内实现雁阵式产业升级，这在很大程度上延长了各类产业的生命周期，减缓了各类产业比较优势的丧失速度。三是地区间的各类差异提高了中国经济抗风险的能力。2008年全球性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中国经济能较快地克服冲击、实现较快增长，一方面固然与政府采取的一系列政策有关，同时，也与中国地区间差异大、政策调整的空间和余地大有关系。当然，客观上，地区比较优势的差异并不必然会转化为多样化的优势，地区之间发展阶段不同，水平不一，只是为发挥多样化优势提供了可能性，要将这种可能性转化成为现实，则离不开中央的各种政策措施。只有全国一盘棋，将地方的积极性和中央的统一领导结合起来，地区的多样化优势才能变成全国的优势。

## 四、结语

阿西莫格鲁和罗宾逊在《国家为什么失败》中对中国经济的成功做过充满臆想的解释，他们主观武断地把中国政府称为“攫取型政府”（2019）。在他们看



来，“攫取型政府”可以通过把资源从一个部门配置到另一个部门，从而拉动经济增长，随着越来越多的资源重新配置，投资拉动对经济增长的作用迅速递减，追赶型任务完成，经济增长转向创新驱动型，此时，“攫取型政府”因为会阻碍创新，从而会阻碍经济的可持续增长（2014）。按这个逻辑，他们预言，中国经济一定会出问题（2019）。阿西莫格鲁和罗宾逊关于“攫取型政府”与创新的关系或经济增长的关系也许是正确的，但其对中国经济未来的预言则永远不会实现，因为他们对中国政府和制度的判断是臆想出来的。中国工业化成功的经验表明，中国政府和制度并不是他们所谓的“攫取型政府”，中国的经济制度，也决非他们所谓的“攫取型制度”，中国的政府是一个推动包容性发展的政府，正是因为中国建立起了包容性学习与创新机制，中国的新型工业化才取得了伟大的成就。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所要求的工业化，是一条体现新发展理念的新型工业化，中国在这条工业化之路上已经迈出了坚定的步伐。2020年是中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最后一年，“十四五”之后，中国将进入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后时期，将为基本实现现代化而奋斗。展望“十四五”，中国的走新型工业化之路虽然面临诸多挑战，如制造业与服务业协调发展的挑战，传统经济与新经济深度融合发展的挑战，国际竞争格局面临深刻变革的挑战等，但可以预期的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后的中国新型工业化之路，必定是一条第一、第二、第三产业更加协同发展，新旧经济更加融合发展，更具绿色化，更具包容性，创新驱动作用更强的工业化。

（来源：“中国经济学人”微信公众号，作者：张其仔，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副所长，中国工业经济杂志社社长）

[Top](#)

## 虎视寰球

全球化加剧外部冲击的力度，既为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提供了机遇，同时又使全球经济的发展更加不平衡，并导致各国政治、经济、外交、军事、文化和社会等等全方位的矛盾和冲突。如何面对巨大的压力和挑战，化弊为利？从决策的角度，不仅中央高层在殚精竭虑，那些有志于在全球化中冲破重围的企业家和改革家更是殚精竭力。那么，双方如何互动？本栏目力求更多的向大家提供有价值的建议和启发。

### 【七国集团峰会何以成为“道义上的失败”】

七国集团峰会日前在英国闭幕。对于国际社会来说，这次峰会乏善可陈，在应对气候变化、防控新冠肺炎疫情尤其是疫苗问题上口惠而实不至。英国前首相布朗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本次峰会将作为一次“道义上的失败”被载入史册。



“世界需要 110 亿剂疫苗，我们只拿出一个涉及 10 亿剂疫苗的计划。”德新社报道说，七国集团疫苗捐助承诺的实际情况“没有听起来那么美好”，其目的之一是希望转移人们的注意力，掩盖其反对放开疫苗专利的态度。

更加值得关注的是，在美国主导下，七国集团已与国际道义渐行渐远。七国集团峰会公报提及涉华议题，就涉港、涉疆、台湾、涉海等问题对中方蓄意污蔑，干涉中国内政。此举严重违背《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违背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暴露出美国等少数国家人为制造对立隔阂、扩大分歧矛盾的不良用心，中方对此强烈不满、坚决反对。近年来，在七国集团框架下，美国利用各种手段拉帮结派，将一些国家拉入其谋求私利的布局，企图妖魔化和对抗中国、俄罗斯等国，使美国的本国诉求国际化、双边问题联盟化、经济问题政治化、政治问题安全化，搞小集团政治的手段可谓花样翻新，丑态百出，已成为威胁国际秩序、国际发展和国际安全的全球治理逆流。

其一，美国在战略上提出抗衡中国的动议。拜登此前在《华盛顿邮报》上撰文，提出所谓“民主国家”应该建立高标准替代方案，取代中国，支持全球发展。拜登政府提出了 2 万亿美元的基础设施建设计划，在美国主导和七国集团其他成员参与下，在发展中国家部署打上所谓“民主国家”烙印的基础设施建设计划，以抵消“一带一路”倡议的影响。美国还试图将台湾问题纳入峰会讨论，用干涉中国内政的方式为中国发展设障。在美国政客眼中，全球治理和全球发展是有色彩、有派别的，只有抹去中国价值和贡献才符合美国和西方利益。

其二，部分成员国分工配合，充当美国马前卒。七国集团成员抓住各种时机，将小集团政治发挥到极致，将国际挑战与中国强行关联，配合美国抗衡中国的动议。比如，澳大利亚政府鼓噪七国集团应强力推动世界贸易组织改革，以抗衡中国。澳大利亚总理莫里森表示，面对“经济胁迫”，要恢复世贸组织争端解决机制的权威性。可笑的是，破坏争端解决机制的恰恰是怂恿澳大利亚对抗中国的美国。此外，日本在钓鱼岛和南海问题上混淆是非，英国在涉港和涉疆问题上颠倒黑白，同样唯美国马首是瞻。

其三，强词夺理，发动舆论攻势。为了实现小集团利益，七国步调一致地热炒“中国问题”，企图用舆论攻势抹黑中国和俄罗斯，为两国打上政治标签——“中国强权”和“俄罗斯恶敌”。七国集团外长会议渲染所谓“中国挑战”，宣扬公平贸易环境正在遭到中国侵蚀，利用七国集团的全球影响将所谓“中国挑战”的叙事国际化。此次七国集团峰会东道国英国甚至反咬一口，英国外交大臣在媒体面前大谈中国“应顾及他国感受”。此番表态罔顾事实，何其荒谬。

其四，自定“全球规则”，实施制度化打压。美国和其他一些成员利用这一机制介入与之不相干的问题，借由峰会发声，将自己变成所谓的“利益攸关方”，使七国集团机制沦为美国借以打压中国和干涉中国内政的工具。此前的七国集团外长公报就已纳入涉港、涉疆、涉藏、涉海问题，严重挑战中国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还罔顾事实，要求对新冠肺炎疫情的起源进行所谓“新调查”，矛头直指中国。在他们看来，制定西方主导的规则并建立所谓“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正是应对中国的方法。七国集团力主将全球企业最低税率定为 15%，目的在于增扩税源，缓解疫情下的美欧财政危机。但对于低税率的发展中国家来说，这将严重侵害发展利益，这种着眼于小集团利益，强行制定全球经济治理规则的方式，本质上仍是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

其五，固守冷战思维，大搞价值观划界。美国等国将澳大利亚、印度、韩国拉入七国集团政治框架，企图建立所谓“全球民主联盟”。七国集团成员在全球



散播虚假言论，污蔑新疆存在所谓“强制劳动”问题，诋毁香港民主和人权状况，无端进行价值观划界，对他国进行价值观归类，人为扩大全球价值观差异，与时代潮流背道而驰。

20世纪70年代，为了应对石油危机后的经济困局，西方工业国家需要协调经济政策，七国集团应运而生，成为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后重要的全球经济治理机制。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在新兴经济体日益崛起的背景下，七国占世界经济的比例早就不复当年，伴随而来的自然是影响力的滑坡和辐射力的衰减。以今天的全球视角来看，七国集团是一个旧时代的集团，这几个国家无法代表人们解决全球问题。

眼下，七国集团的全球经济治理功能正在迅速退化，成为美国等发达工业国家向国际社会强加意志、制造对抗、裹挟舆论、实施霸凌的工具。国际关系学者萨米尔·阿明称之为“分享的帝国主义”。美国次贷危机及后续危机证明这一机制并未对全球经济治理发挥应有的作用。事实上，七国集团机制已经千疮百孔。一些欧洲盟友对联美遏华举棋不定，一些成员国难以承受在中美之间选边站的代价。本已日薄西山的七国集团机制，更因美国等国的拙劣表演加剧了其全球声望的坍塌。此次峰会的声明和公报完全基于小集团利益，严重缺乏全球公正和道义的基础，甚至在毫无事实依据的情况下散播虚假信息，构陷和攻击他国，成为制造国际纷争的机器。世界多极化、国际关系民主化是不可抗拒的时代潮流。一国或一个国家集团号令天下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当前形势下，国际社会比以往任何时候更需要加强团结合作，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而不应基于“小圈子”利益搞“集团政治”，不应以意识形态划线打压不同发展模式，更不应混淆是非、转嫁责任。特别是疫情之下，全球经济困难重重，全球治理任重道远，中国欢迎明辨是非的合作者借中国经济增长的东风缓解困境，共同推动全球治理体系的变革，但小集团政治的逆流可以休矣。（据《光明日报》）

[Top](#)

### 【大幅上调通胀预期 美联储放“鹰”了】

夹在持续爆表的通胀数据和缓慢增长的就业指标中间，美联储这一次的决策实属艰难。维持基准利率不变和保持购债规模基本都是市场的意料之中，不过，大幅提升通胀和加息预期，多少还是有些意外。这似乎意味着，美联储也对通胀有所警觉了。

#### ■维持基准利率不变

在经历了两天的会议之后，美国东部时间6月16日，美联储公布了6月的货币政策声明，维持基准利率在0%到0.25%的目标区间不变，同时每月债券购买规模也保持在1200亿美元。不过，面对当前市场资金过度充裕的情况，美联储将隔夜逆回购协议的利率上调了5个基点至0.05%，将超额准备金利率上调5个基点至0.15%。比起上述两项政策，真正令市场意外的是，在当天一同公布的美联储经济预测中，美联储大幅上调了对今年通胀的预期，上调至3.4%，比3月份的预测高出了整整一个百分点。但美联储会后声明则继续表示，通胀压力是“暂时的”。即使上调了今年的通胀预期，该委员会还是认为，从长期来看通胀率仍将趋向美联储2%的目标。更值得玩味的，是美联储主席鲍威尔当天的讲话，他表示，最近消费者价格的上涨可能是暂时的，但警告说，这种上涨最终可能比预期的更高、更持久。



“随着重新开放的继续，需求的变化可能会大而迅速，瓶颈、招聘困难和其他限制因素可能会继续限制供应调整的速度，从而增加了通胀可能比我们预期的更高、更持久的可能性。”鲍威尔强调。至于外界关心的缩减 QE 问题，鲍威尔表示，目前没具体时间，需要看到显著进步，有具体时间之前会提前告知。鲍威尔称，此次会上只能算是“谈论了讨论 taper”，即并非正式的 taper 讨论。他称，美联储将竭尽所能地避免减码 QE 引发剧烈市场反应。

另外，美联储还提前了下一次加息的时间框架。根据美联储官员们作出的“点阵图”预测，加息最快可能在 2023 年发生。而此前在 3 月，他们曾表示，至少在 2024 年之前都不会加息。具体来看，点阵图显示，美联储在 2023 年里将会加息两次。其中，7 名委员预计在 2022 年开始加息，今年 3 月为 4 名委员。13 名委员预计在 2023 年开始加息，今年 3 月则为 7 名委员。对于加息问题，鲍威尔强调，这次会议没有讨论什么时候会加息，并警告不要过度解读点阵图，称它不是未来利率走势的好预测器。美联储当前的重心放在经济状态，而不是加息，现在讨论加息还为时过早，加息根本不是现在会议的焦点。更高的中性利率将为美联储降息提供更多空间，对那些推高中性利率的因素保持警惕。

### ■不够“鹰”派？

这次的表态，显示出美联储的态度似乎开始转弯。在美国银行的美国短期利率策略主管 Mark Cabana 看来，6 月 FOMC 决议是美联储立场的显著变化，“美联储对通胀的风险看法似乎发生了重大转变。这表明美联储认为通胀存在上行风险，而且可能已经反映到了点阵图上”。

经济学家 Frances Donald 表达了类似的看法。他称，点阵图显示，到 2023 年，美联储将加息两次。这对债券市场来说是一个足够的鹰派惊喜。美联储没有实质性地改变其对 2022 年和 2023 年 GDP 增长和通胀的预测，虽然前景没有明显改变，但美联储对恢复正常的信心似乎已经改变。

的确，资本市场也由此掀起了巨大波澜。当天美元指数大幅飙升到 91 以上，十年期美债收益率则也大幅上涨了 8.15 个基点，收于 1.58%。截至 6 月 16 日收盘，美股三大股指集体收跌。其中，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下跌 265.66 点，收于 34033.67 点，跌幅为 0.77%。标准普尔 500 种股票指数下跌 22.89 点，收于 4223.7 点，跌幅为 0.54%。纳斯达克综合指数下跌 33.17 点，收于 14039.68 点，跌幅为 0.24%。

或许是越来越多的通胀指标，让美联储的压力与日俱增。最新的数据显示，5 月，美国 CPI 同比增长 5%，超出市场预期的 4.7%，创 2008 年 8 月以来最快增速；当月核心 CPI 同比增长 3.8%，同样超出市场预期的 3.5%，创下 1992 年 6 月以来最快增速。至于美联储最看重的指标——核心个人消费支出通胀（PCE），这次的 FOMC 声明也显示，2021 年、2022 年和 2023 年的核心 PCE 通胀预期中值分别为 3%、2.1%、2.1%，而这组数据在 3 月的预期分别为 2.2%、2%、2.1%。

不过，也有人认为，美联储并没有预期中的鹰派。在发布会上，鲍威尔也强调了，更高的通货膨胀来自于受重新开放影响的行业的更高价格影响，这种情况将随着时间的推移而逆转；从长远来看，推高通胀的因素可能只是暂时的；随着时间的推移，特定的通胀驱动因素似乎会逐渐消失；预计未来几个月供应会增加，通货膨胀会下降。

“现在对通货膨胀的判断，也有很多不同的观点，有些人认为比较严重，也有观点认为下半年会好转，不会是很严重的问题，”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孙杰坦言，“我个人觉得还得再看，美联储虽然说得比较严重，



其实也没有真正实施行动，这与我们的判断至少目前是没有冲突的。”

孙杰指出，自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通货膨胀的问题一直是个谜，除了一些内生因素以外，现在又加上疫情、贸易政策等很多外生因素，确实比较复杂，出现了结构性变化。现在大家都是看预期的冲击，并非政策真正落地后带来的冲击，可能等真正政策落地之后，还不如预期的冲击大。

### ■ “回血”进行时

在爆表的通胀数据背后，是美国开始放开经济活动。以加州为例，6月15日起，该州解除防疫等级限制的相关规定，全面恢复开放经济活动，这也是15个月后加州全面放开，疫苗接种是加州决定“解封”的重要因素。美国总统拜登曾定下目标，打算到7月4日独立日假期前让美国70%的成年人接种至少一剂新冠疫苗。根据加州新冠疫情官网 covid19.ca 公布的数据，共有大约4000万剂疫苗被注射，整个加州55.6%人群完成了疫苗接种。

与加州一样，纽约州州长也于6月15日宣布，鉴于当地民众的疫苗接种率已达新高，将取消几乎所有对企业和社交聚会的防疫限制。在不少地区陆续放开的背景下，旅游业的复苏显而易见。根据美国运输安全管理局（TSA）的数据，约196万名旅客于5月28日通过民航出行，创下2020年3月7日以来单日最高吞吐量。对于近期的走势，美国航空集团预计，夏季国内航空旅行需求将达到2019年90%的水平，国际航线客运量将达到2019年同期80%的水平。

彭博经济学家 Chris Anstey 就指出，美联储关于疫情和经济风险的措辞有所调整，更加积极。4月时措辞为“目前的公共卫生危机继续给经济带来压力，经济前景仍存在风险”，这次的措辞则为“疫苗接种方面的进展可能会继续减少公共卫生危机对经济的影响，但经济前景仍存在风险”。

不过，这并不意味着复苏就是板上钉钉了。美联社在报道中指出，美国最近日均疫苗接种人数从两个月前的接近200万人减少至40万人。如果要达到拜登设定的目标，美国大约1550万名成年人需要在今后四周接种至少一剂疫苗，而按照当前的进展来看，这个目标要达到并不容易。

“我觉得美联储还是比较谨慎的，现在的表态更像是在平稳市场，给市场吃一颗定心丸。”孙杰表示，如果今年美联储要缩减购债，其实也并不意外，这个话题也已经提出一段时间了，眼下疫情的冲击没有想象中那么严重，不可能持续这么弹药充足，至于缩减多少、具体节奏如何，还要再看。（据北京商报）

[Top](#)

## 【十年后再回谈判桌 美俄关系却仍难破冰】

当地时间6月16日，美国总统拜登在其欧洲之行的最后一站瑞士日内瓦，将迎来他担任美国总统以来，与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的首次会晤。事实上，10年前，还是美国副总统的拜登就曾与时任俄罗斯总理的普京，在莫斯科进行过面对面会议。当时，拜登称，美国希望以反映两国共同利益的方式，“重新设定”美俄关系。如今，两人又将坐到谈判桌前。但这一次，双方若想仅仅通过一场领导人峰会，就让陷入低点的俄美关系取得本质性突破，却似乎“不太可能”。

### ■ “老对手”再交锋，这些议题将摆上谈判桌……

日内瓦时间6月16日13时(北京时间19时)，俄美领导人峰会将正式开始。据俄总统助理乌沙科夫介绍，普京和拜登的会谈将由一次小范围会谈和两次大范围会谈三部分组成，期间将有茶歇。至于会谈持续多久，乌沙科夫称，“一切取



决于讨论进行的情况，以及两位总统的心情、哪些问题占用的时间会比我们计划的长。”一位熟悉美俄峰会筹备情况的消息人士称，谈判计划进行近5个小时。

另外，根据美俄双方的预热放风，此次会晤议题十分宽泛，涉及到双边关系、战略稳定、军控、热点地区冲突调解、反恐、新冠疫情、网络安全、人权、环境保护等各领域。

### ■美俄关系最低点时的会晤，“调门儿”一降再降

峰会前夕，美俄关系持续紧张，制裁战、口水仗几乎成为常态。普京和拜登日前先后表示，美俄关系正处于“近年来最低点”。中国社科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研究员张弘称，美俄关系处在一个“较为危险的境地”，这是促使“普拜会”举行的主要原因。

普京曾表示，此次会晤目的是改善双边关系；拜登也说，会晤旨在寻求双方关系的“稳定性”和“可预测性”。不过，美俄双方在峰会前仍持续释放消极信息。对此，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美国所助理研究员孙成昊解释称，对美国来说，美国国内“反俄仇俄”情绪未消散，尽管拜登没有前总统特朗普“通俄门”的包袱，但他执政以后，包括指责俄干涉美国大选、指责俄参与黑客攻击美国行为等，“让拜登没办法在外交上对俄展现太柔软的身段”。

“俄罗斯其实也是一样的”，孙成昊称，由于美国对俄的外交施压、经济制裁一直以来都是层层加码，在俄现行治理模式下，不可能对美国有缓和的姿态，俄罗斯的国内政治也决定了普京不可能对拜登过度示好。不过，多方预测，美俄双方将在非核心利益方面达成合作，包括气候变化问题、抗击新冠疫情问题等。张弘称，“美俄之间可能在这些领域达成一定共识。通过非核心问题来营造或者恢复这样的对话，我觉得才是这次会晤的最主要目的。”

### ■欧洲行最后一站见普京，拜登在给自己“打气”？

此次拜登与普京在日内瓦的会晤，是拜登欧洲之行的最后一站。在此之前，他先后出席了G7峰会、北约峰会和美欧峰会。

在张弘看来，“先盟友、后竞争对手”，这个顺序是正确的。“通过三场峰会，为拜登与普京见面提供强有力的联盟外交的支撑。实际上，美国是代表着西方阵营与俄对话，这样它在地区安全问题、区域经济合作问题、在意识形态和价值观上，至少已经有了所谓的‘联盟的声音’，超越了美国本身，部分代表了欧洲立场。”张弘指出。孙成昊也表示，这样的行程安排是“精心设计的”。若拜登提前跟普京有来往，首先他心里没底；其次，拜登也担心欧洲盟友认为，美俄会采取这种“越顶外交”的方式，达成一些不利于欧洲的安排，这对于拜登巩固跨大西洋关系也是不利的。

### ■“对话”已是最好的结果？俄美或难在关键问题上实现突破

早在1985年，美苏领导人就曾在日内瓦举行过峰会，且那次双方会晤被视为是两国走出冷战的转折点。不过，对于此次峰会的结果，外界普遍不乐观。

张弘指出，首先，美俄在俄反对派人士纳瓦利内事件上分歧重大，而这“属于俄罗斯的‘红线’”，俄一直反感美西方对于俄内部民主事务和政治事务的直接干涉。其次，是“安全红线”，美国为首的北约国家在巴尔干半岛和黑海地区的频繁活动以及前沿部署，威胁到了俄西部安全。

孙成昊还提及美俄之间更具体的矛盾——制裁问题。俄在经济上最关切的是，美国什么时候可以把制裁取消。但首先，美国国内“反俄仇俄”的情绪高涨，国会不可能在这种状态下取消对俄制裁，而拜登政府在制裁上至少没有太多筹码。总的来说，专家预测，这次峰会很难让双方在关键问题上实现突破。



孙成昊指出，美俄在氛围上会有一些局部的改善；此次会晤将可以让大家对美俄关系有“更加稳定的预期”。张弘则称，尽管峰会不能达成突破，但不意味着未来美俄不能实现经常性对话。这种大国的经常性机制性一旦恢复，对俄罗斯十分有利，有助于俄罗斯打破西方对其外交孤立。“两位领导人会就很多事情争论不休，但对话会继续下去。”美国前总统乔治·W·布什政府的驻俄大使亚历山大·弗什博指出，而这是“人们能想到的最好的情况”。（据《光明日报》）

[Top](#)

## 华夏透视

善于学习的人懂得把观察、经验和知识转化为智能并使用得当，不仅能把梦想持之以恒，更懂得如何事半功倍。投资大师巴菲特在给其老师本·格雷厄姆的著作《聪明的投资者》所写的序言中说：“长年进行成功的投资并不需要极高的智商、罕见的商业洞见，或内部消息。真正必要的是做决策所需的合理的知识框架，以及避免情绪化侵蚀智识的能力。”本栏目力图提供一个中央高层动向及其影响分析与政经趋势分析相结合的框架，从而达到把握最关键、最重要的决策信息和决策要点的效果。可以说，我们的研究和分析也将因此得到升华。

### 【关键的改革与质量的提高：中国高校人事制度】

决定现代高等学校质量最重要的是教师。教师质量决定教育质量，也决定研究质量。因此，高校的教师人事制度决定了高校的质量。因为人事制度的敏感性，也因中国的文化因素，成功地进行了人事制度改革的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都没有对外描述其改革过程和改革的成功，不是很多人清楚建立预聘制（tenure system）对提高两校质量的至关重要作用。预聘制不仅是中国高校二十年来最重要的人事制度改革，也是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迄今最佳的、行之有效的教师人事制度。最近因为突发事件，舆论几乎一边倒支持上海高校的犯罪嫌疑人，嫌犯本人只声称自己受迫害的一面之词、并未说迫害来自预聘制，但是大部分匿名的不负责任的写手越过自己并不清楚的案情直接全面猛烈批评我国高校的预聘制，从指责预聘制不合法到批评预聘制压制青年，各种说法甚嚣尘上。事实上，这些批评几乎全部搞错了对象。被批评的不是预聘制的问题，是原有体制的问题，或我国尚待改变的传统习俗问题。而预聘制已经、或正在解决其中一些问题。

北大清华多年来坚持改革，包括预聘制为主的教师人事制度改革，有效地改善了高校的生态，特别是以较好的资源支持年轻人独立开展工作，逐渐摆脱了原体系近亲繁殖、任人唯亲等诸多缺陷，终于可以批量（而不是个别）产生走向世界前列的自然科学学者。如果改革不被各种因素导致逆转，应该有信心为中国、为人类做出的贡献越来越大。



这一改革有很多人支持、推动和不懈的努力。有些文章称我和施一公是始作俑者，这一说法并不准确。不仅校外有先例，而且两校内部就有很多人起了重要作用。但说我们是中国高校成功地进行人事改革的践行者，我们受之无愧。我们为参与中国高校发展历史重要一环而感到自豪。

但是，每个学校何时用、如何用好预聘制，是需要认真思考和负责地掌握的问题。在认真负责的高校实践中已做到可以约束高校各级领导个人在年轻人升迁方面权力，可以为其他单位所借鉴。

### ■我与中国高校预聘制

如果只是很多人如火如荼地转发多篇匿名作者不负责任的文章，笔者可能也与很多知情人一样听之任之，认为预聘制不可能在中国被逆转。但是，与我有关的《赛先生》也发表了我不认同其观点的文章，虽然我丝毫没有干涉这篇文章的发表，也永远不会问文章的来源，但感到有责任发表自己的观点。

另外，笔者有可能是对中国高校的预聘制了解最多的人。我和施一公都完整地经历美国高校的预聘制全过程，从助理教授到讲席教授。我们不仅对美国为什么这样做有深刻的理解，而且我们都在中国的科研和教学体系中有实践，知道应该怎么做、哪些可以有益、怎么可以有效。但是，首先在中国实行预聘制的是1999年11月成立的中国科学院上海神经科学研究所，蒲慕明为所长，提议建立研究所的人是蒲慕明、吴建屏、鲁白、梅林和我。其预聘制的人事体制，我也参与制定。中国第二个全面实行预聘制的研究机构是2004年成立的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所长王晓东和邓兴旺，我曾担任其学术副所长，估计其预聘制的体系是我落在文字上，至少初稿是我写的。2007年我回国出任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院院长，在北大校领导和职能部门的很多人支持下，生科院是北大第一个对新的教师全面实行预聘制的学院。施一公在清华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开始清华的第一个预聘制学院。因为我们的实践，证明预聘制如何在两校行之有效，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协调于2014年将预聘制全面推广到两校全校，所有新聘教授系列人员，都进入预聘制体系。从开始到现在已经14年，全校实行也已7年，两校对此很满意。我自己还在2018年起参与建立北京脑科学中心，它也是预聘制。施一公在杭州建立西湖大学，从开始就全面实行预聘制。我还参与帮助北大在深圳建立深圳湾实验室，其体制最初是我让北大理学部办公室为它设计的。

但是，中国的预聘制不是我和施一公所开始。除了上海神经所和北京生命科学所启用预聘制，就是北大，也在1980年代就有周培源校长在国内介绍过美国的预聘制。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在2000年代早期都曾经推行预聘制的类似人事体系，当时有人称为“非升即走”，引起轩然大波，表面似乎流产。但北大清华很多有识之士知道预聘制的重要性，所以两校的连续几任的校领导和职能部门有很多人继续努力。对于国外的预聘制运行细节，都是两校人事部门仔细研究，提交校领导。预聘制，是中国高校和科研机构渐进式改革的一步，是很多人的共识、是很多人努力的结果。

### ■预聘制的核心

预聘制的核心是如何招聘、支持和晋升教授系列的教师。简单模式是：助理教授—副教授—教授。有台阶、每一步需要审核质量，支持年轻人学术独立。其中最重要的台阶是从预聘轨（tenure track）的助理教授（assistant professor）成为长聘副教授（tenured associate professor）的长聘审核过程（美国有少数大学只有教授才是长聘，而不是在副教授这步）。具体而言，所有助理教授职位为公开竞聘，北大清华一般是全球招聘。一般是博士后（或有些学科的博士）竞争应聘，



在院系经过招聘程序（推荐信、委员会评审、面试、学术报告、委员会投票）后，报请学校的委员会投票，再成为助理教授。

预聘轨的助理教授享有独立学术待遇，不从属于特定老教授、大教授。而且不再经过其他评审就可以招研究生（北大清华是自动成为博士生导师，而不需要入职后申请、评审再成为博士生导师）、有研究空间（如一百到数百平方米的实验室面积）、研究条件（如共用实验仪器，实验科学助理教授所需要的启动经费，例如目前国内不同学校的生命科学助理教授的启动经费是一人百万到千万不等）。助理教授第三至第四年，所在院系形成小组，并咨询校外（包括国际同行）其学术状况，对其发展状态进行评估，告知个人评估建议（优势、弱势，注意点），供其参考，以便给其合适的指导、促进其职业发展、分辨其潜在问题，并向学校提交评估报告备案。除非出现极端情况，一般三年评估并不导致解聘。我在北大十四年，没听说过两校有三年解聘的，所以三年的评估主要是帮助青年教师，而不是压力。

在 6-8 年后（取决于不同学校，北大是一般 6 年，如果有理由可以延长一到两年，但一般只能提前，不能无道理地推迟），需要进行评审。一般是院系为每一位进入评审的助理教授形成一个小组，负责收集其学术评审资料，包括全球同行的评价信，一般是十几封信。发出请求和收回的记录全部在案，如果被邀请评审的很多人不愿意评审、不愿意回信，回信率很低也是一种无言的表态，虽然一般后来还追加评审信，但这一记录会给以后评价带来提示。小组收集资料后，有自己的意见，提交院长，院长请院学术委员会评审，包括候选人给全体学术委员会成员或全学院教授作学术报告，委员会和院长都看校外评审信，然后院学术委员会和院长分别写评价报告，上交学部，再上交学校的评审委员会（各校的名称不同，北大是三个人才委员会，分别为理工科、人文社科和医学）。学校的委员会提前指派学部的人读材料，院长或其代表到委员会为每一位候选人陈述。委员会根据材料（履历、代表性学术工作、评审信、院系学术委员会意见、院长独立意见、教学评价、师德师风报告等等），在听取院长汇报后提问，最后无记名投票决定是否该助理教授可以成为长聘副教授。获得通过者，得到长聘（tenured），可以提高待遇继续在学校工作。未获得长聘副教授者，可以申请缓期一年离开学校。申请正教授是一般的常规，但在获得长聘副教授后，正教授不是“非升即走”，只有助理教授成为副教授的长聘的评审是“非升即走”。

### ■ 预聘制的优点

预聘制之所以广为推广，是因为其显然的优点。在中国，预聘制的优点可以通过与以前的比较而显出。预聘制的所有聘任人员，有明确的合同，有明确的法律依据，如果用人单位不践行预聘制的合同，可以被法律管束。中国高校（和研究机构）以前聘任没有合同，不过是一纸通知，其中各种待遇和条件的没有明确，被聘任的人只能接受或不接受（take it or leave it）而没有法律保障的依据。

1950、1960、1970、1980 年代，中国高校的职位，一般是本科生或研究生留校所产生，不是公开招聘。内部如何操作，不能说是黑箱，但每一次都可能出现与前一次和下一次不同的因素，而且常常不是学术因素。如果说北大，我三舅不仅是 1953 年江西高考第一名入学，而且在北大物理系无线电专业五年本科全部功课是 5 分，如果按成绩留校，理应是，但事实不是这样。

获得留校后，并不给年轻人的特定工作条件，也不可能谈判工作条件。那时，中国高校普遍缺乏研究条件。留校后，更不可能学术独立，而一般加入某个原有教授的团队，如果老教授还有条件，可以分享资源，也还能做研究；如果老教授



没有条件，或加入不了。留校后，一般不能带研究生，而是需要很多其他过程之后才可以。而逐渐成长的教授晋升规则不是很确定，年轻人与老教授的关系也可能经常出现问题、甚至矛盾，因为一开始就关系不明。

1990年代后期到2000年代中期，中国开始招聘从国外回来的留学人员。但一开始并无公开招聘，而是各单位各行其是。中国科学院第一个在《科学》期刊（Science）上公开招聘的英文广告估计是我写的，因为还在我计算机上。

当时科学人才大量外流，1990年代中晚期中国科学院很多研究所找不到所长，高校不仅缺教授而且缺院长系主任。求贤若渴的中国对国外回来的博士、博士后非常欢迎，一般是立即给予正教授职位，而且常常很快成为行政领导。有些人很快就脱离研究专职做行政。有些人的行政做的很好，帮助了中国发展，也有些人浪费中国资源、阻碍甚至长期恶劣地阻碍中国科学的发展。因为一旦得到职位后不用再经过考验，没有预聘制的“麻烦”，当然有的是时间做其他事情而不会有负反馈。一批人没有养成学术的习惯，对科学没有热情。

中国逐渐开始有研究的启动经费，但量不多的初期用职称抵经费，启动经费有多有少、能否带博士生取决于单位或单位领导人，无一定规则。在没有预聘制时，很多高校每年要求各级教授述职。我到北大后首先取消了生科院的教授述职，因为每年述职不仅不合适年轻人，也不合适年资高的人。很多高校晋升是靠院系内部，经常出现非学术因素。有时为了某个投票，教授们分派对抗。

在老体制中，确实有少数老教授、大教授学术卓越、人格出众，能够任人唯贤，为学校、为国家选拔和支持年轻人。但是，不可否认相当多的是任人唯亲，为自己找帮工，而不是为国家出人才。如此，一批又一批年轻人没有得到最佳发展可能。预聘制后，年轻人靠竞争得到自己的职位、谈判自己的条件，立即成为独立的学者、科学家。获得高于非预聘制人员的收入待遇和研究条件。而且他们都知道六年后会有同行专家为主的学术评价，要真正成为世界上被公认为学术优秀才能在北大清华继续工作。

这样，一批年轻人不仅得到超出以往的支持而可以安心进行学术工作，而且目标很明确，靠校内、国内搞关系不行，也就不能像以前有些人经常花很多时间在国内搞经费、拉关系。北大清华在中国媒体的科学新闻减少，与此也有关：出中国新闻没有用，能够学术服众，在世界学术界服众才行，上中国的新闻不仅没有帮助可能还有害。这批年轻人也不用担心与老教授、大教授的关系，只需要堂堂正正的正常关系。校内正常交流应该有，但在校内攀高枝无助于得到国际学术界的肯定。北大实行预聘制后，原来与其他单位一样较为普遍的大教授、老教授带小教授的情况大大减少。而老师把学生留在学校的近亲繁殖非常困难，除非显示学生已经独立于老师。北大有位老师的学生无法留校，虽然其研究非常好。他申请清华很快就得到职位，可以高高兴兴地独立（清华不要而到北大的也有）。

经过6年至10年的坚持，预聘制晋升的教授一般较易养成学者的良好习惯，珍惜其自身的学术努力，从而长期有良好的追求。

### ■ 预聘制的“问题”

预聘制在所有方面，对于大学都是好，对于某些人不好那不是学校的责任。

批评预聘制的人，一部分是不知情，有勇气而不了解事实；一部分是误解而简单地认为中国实行的体制就是不好、包括改革的体制；一部分是希望得到益处而不用负有责任；一部分是因为自身利益而反对改革；一部分是永远反对改革。

有些人误认为预聘制为校领导累积“政绩”、有助于其升官。实际上，预聘制是人事体制改革，大多数单位的领导都不愿意进行，有些单位长期有条件而坚



持不做人事体制改革，单位的人员只进不出、越来越大，慷国家之慨的领导远多于敢于为国家发展而担当的领导。没有、也不可能因推进教授预聘制改革而校领导得以晋升的可能，因为改变人事制度最容易吃力不讨好，为学校、为国家做了事而被人诟病的时常出现。中国有大学一百多年来，恐怕找不到一个校长因为人事体制改革而升官的。也没有一位大学校领导因为逼年轻教授出论文、甚至出真的科学成果而升官。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最近十几年成功建立预聘制人事体制的过程中，都不敢声张，当时所有文件都是纸板，担心电子版被透露出去造成舆情和反弹。我来北大换了五任校长、三任书记，其中不乏前赴后继、忍辱负重坚持改革的领导，但没有一位的升迁是因为敢于建立预聘制、提高了北大教授队伍质量、或增加了科研成果而“升官”的。学院层面也基本如此，虽然不是百分之百都是这样。

很多国外、或国内体制外的人、或年轻人不知道高校年轻教授出科研成果并不能让哪位校领导升官。而一般校领导都懂得不要触碰人事等敏感的事情，不要有事，才是升官的必要条件之一。北大在任校长从来不做委员会成员，一票都没有，更无法压年轻人出文章。所以，凡是批评预聘制是哪个学校领导为了建立政绩可以剥削年轻人是误解。而预聘制给予年轻人学术独立才是解放了年轻人，不用为哪位老教授拎包，不用看哪位大教授的脸色，集中精力做好自己的学术，提高中国的学术质量，为中国培养人才、出成果，为自己积累学术沉淀。

有人误以为院系在预聘制有很大的权力，或个人有很大的权力，其实都不对。预聘制后，一般院系内部的人因为互相都认识，从而都让候选人通过，不通过的极端少，少到十几年来我从来没有在北大听说过院系不过的。院系普遍把可能解聘的责任推给学校的委员会。学校的委员会一般都不认识候选人，所以比较客观、至少比较超脱。在选拔委员会成员得当的时候，委员会敢于担当。大家都知道需要支持年轻人，但大家也都知道自己在委员会是为学校把关、为国家把关，在学校已经有相当时间投入后，是否应该继续支持特定候选人，一定会很慎重，不会轻易否定。委员会刷掉过多个近亲繁殖的人，不让招聘、不让晋升。委员会也支持过多个学术非常好，但一时记录不一定按一般人认为的在什么刊物有什么文章。所谓上海某校学院层面的书记，在预聘制体系不可能否定一个人的晋升，而是学校的委员会的决定。学校的校长、副校长也不敢发言压制或帮忙，因为委员会无记名投票不会听，北大评审过程从来没有校领导打招呼，恐怕打了招呼其反作用的可能性很大。曾经有学院层面的人事先做工作，结果投票是零票，说明大家不仅不同意，而且反感这种做法。而校领导的学生，也多次被淘汰，因为大家介意近亲繁殖，不支持任何人的学生留校，除非有非常特殊的有道理的学科建设，一般来说是已经与自己老师在学术上分道扬镳的前学生。

有人造谣预聘制的助理教授通过长篇评审的率很低，低到几千人才通过几十人。这完全不可能。北大清华的通过率估计是全国最低的。我基本从头到现在参与了北大理工科的大部分评审，通过也从来高于百分之五十，有时某一轮百分之二十、三十没有通过，就比较震撼。没有出现过百分之四十解聘率。所谓华中某校一百多人只有十几人得到编制，那些不可能是预聘制，而正好是非预聘制才会出现的现象。没有一个学校会愚蠢到给一百多人很好的条件之后，淘汰其中大部分，那不仅说明招聘环节有问题，而且大量浪费学校的资源，是不可能发生的。基本可以推测那些都是非预聘制雇佣的人。说明预聘制优于非预聘制。

全国其他任何学校都不可能出现过聘用几千助理教授。没有学校有这种经费。预聘制的助理教授费用很高，北大清华付不起，其他国内高校也付不起，而



且时间不对，北大的 2007 年只在学院和某些中心，2014 年才全校推行预聘制，迄今 7 年不可能聘上千人，其他学校的预聘制时间短于北大清华，更不可能上千人。匿名瞎写的不能成为以讹传讹的依据。

### ■改革来之不易大家应该珍惜

预聘制是中国高等学校二十年来最重要的人事改革。是中国高校质量提高、学术进步必不可少的一步。是否用预聘制不是问题，各个学校何时用预聘制，怎么用好预聘制，都是需要认真探讨的问题。对于学校各级领导，需要监督和制衡，但这正是好的预聘制可以做到的，也是认真负责的单位以及通过实践做到了的。

如果不用预聘制，用什么？按 1950-1990 年的不公开招聘，只内部遴选、招聘只给职务不给条件？或者是 2000 年前后的招聘后职务一次到位成为正教授，以后不再评审？各行各业都有评审，高校为什么一旦获得教职就只能是铁饭碗？高校教师可以考核自己的学生，自己不用被考核？小学生、中学生不用考核？大学特别？那么退回大学入学也不用考核的时代？显然，其他方法皆遇到“此路不通”的问题。

各个学校使用预聘制需要认真负责做好工作。需要各校不仅设计好，而且执行的过程认真负责。各个委员会需要由有水平、负责人、愿意花时间的人组成，多个环节都需要制衡，避免领导或其他个人决断，要有利益冲突的回避制度。校外评审是一个重要环节，但不是很多国内的高校能够得到国际评审，会有校外国内评审的需求。而国内评审教授还是新生事物，需要逐步建立良好的文化，不可能很快到位，一般学校在短时间内用不到预聘制的全部优点。这不是预聘制本身的问题，而是所有国内评审的问题。

预聘制在北大、清华比较容易实行，而在中国其他高校，可能只有少数容易用上国际评审，一般学校可能难以得到国际同行评审，可能需要国内同行评审。这时问题就来了，国内很多人没有进行过严肃的评审过程，经常抄袭候选人的自述，等于没有评审。在我们神经科学界，我看过的国内学者评审信写的很有效的是蒲慕明和浙江大学的段树民。所以，需要有人能够组织校外专家的切实评审，要不然都由校内就缺乏了客观评审。

全面否定预聘制是害中国高校，害中国高校的年轻人，害中国。有些所谓对预聘制的批评，实际只是批评学校某些个人和某些现象，而与预聘制无关，没有预聘制照样有这些问题，而且问题常常可能因为没有预聘制而更大。

中国在高等教育和科学技术体制和机制方面，不断通过稳定的改革，迈出坚定的步伐，逐渐完善。渐进改革，关键在于改革。不改革没有前途，改革是必由之路。渐进改革，方式在于渐进。问题很多，不仅要考虑全局、比较问题的主次，择期要点，也要考虑哪些时候到了，哪些还欠火候。渐进改革，需要看到已经在国内实践成功的模式，加以推广，使中国已经付出的学费能够取得设想的效果，而不是每次求新，放弃已有的成功模式。对于国际经验，应该积极思考对中国是否合理、可行，对于有用的经验，积极引进，使人类的知识、包括管理知识，为我所用，无需顾虑其来源。

渐进改革，需要有目标，而不是盲目、也不是机会主义，目标可以因为认识的变化而有调整，渐进改革不能不出声音。传统习惯是，激进变革和顽固保守两方对峙，而且声音很大，渐进改革反而夹在中间，不好出声。温和与渐进受制于两极，使一般看上去只有两种极端的选择。渐进改革必需有声音，让大家看到渐进是非常值得和可能的可选项，而避免被两极误导。

（来源：“饶议科学”微信公众号，作者：饶毅，首都医科大学校长，教授、



**我们的一切努力都是为我们的客户——  
提升竞争优势，共同创造持续长远的收益**